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12 期（总第 308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5 年 12 月 5 日

-
- ◆ 杜润生同志开创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局面.....卢 文（1）
 - ◆ 杜润生同志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郭书田（15）
 - ◆ 新中国以来历年的农业大事记.....吴天锡（18）
 - ◆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生态经济生物资源系统建设问题.....任荣荣（29）
 - ◆ 我国农业当前面临的巨大转变.....卢 文（26）
 - ◆ 关注农业走出去，互利共赢发展境外农业合作.....朱丕荣（36）
 - ◆ 关于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孙万鹏（38）
 - ◆ 健康箴言.....刘济民（42）
 - ◆ 在第 52 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的发言稿孙万鹏（47）
 - ◆ 借鉴发展“第六产业”概念，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郭书田（53）

杜润生同志开创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局面

卢 文

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噩耗传来，内心十分悲痛，谨以此文悼念。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党中央领导的，但具体的领导组织工作则由杜润生同志按中央指示进行的。杜润生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春至1956年3月，在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1979--1982年任国家农委主管政策的副主任；1982至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对我国农村情况很熟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按照中央的意图具体组织领导了农村的改革，突破种种障碍，开创出农村改革的新局面，为我国初期的农村改革作出重大贡献，也是他的伟大的杰作。

在杜主任领导下工作的十年

1960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文革”中被发配到广西。1979年春，到北京申诉落实政策时，适值原在中央农村部工作的霍泛同志由广西到北京医治胃病，经他介绍我找杜润生同志到了新建立的国家农委工作。因要回广西搬家，9月才到国家农委报到，分配在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80年夏，中央财经小组准备在3—5年内，拿出15亿元建设生产基地。杜润生副主任请翁永曦组织农口七个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农科院）的十多个人成立一个考察组，让我和周平带领到全国十来个地区考察，考察结果建议报中央作参考意见。杜主任说，此次考察是作为一次练兵。每当调查回来，他都要亲自听汇报作指示。通过调查，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全国各地不同的情况，学到很多东西。

1982年初，中央决定精简机构，撤销国家农委。杜润生同志认为，农口的人散去容易，集中却不易，于是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争取了少数编制和经费，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同时任命我为联络室主任和评议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全国农经理论界和部分农村工作人员，就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开展深入的论证，写出研究材料，提供党中央和农村政策研究室作决策参考，并将课题成

果进行评奖，编辑成书出版。开始时，联络室还需负责对国外农经理论界的联系、外派和组团出国考察等，后因工作太多，忙不过来，请求划出此项工作，另成立了外事组。按照研究室的要求，我们办了一份专门反映不同意见和开展争论的刊物，杜润生同志为其定名为《农村问题论坛》。他特别关注刊物的工作，经常作些指示，主张要将刊物办活，多反映创新意见。1984 初，杜主任提出在全国选择不同类型的地方进行全面系统的农村调查，为此成立专门机构，申请足额经费，布设了 270 多个点，组织了 1880 多人的调查队伍，其中让我起草调查纲目及参与该项工作。经过一年多完成调查。1985 年 7 月又要我负责组织 11 人，将调查材料集中整理出版（后来印出 16 开的 8 大本），并向中央写出综合报告。之后，在调查点的基础上成立农村固定观察点，随时跟踪调查变化情况。我继续参与了该项工作。后又在全国十多个地方，就不同问题办起农村改革试验区，我继续参与进来。每年起草农村工作文件前，杜主任都组织我们分头到全国各地调查，回来后他都一一听取各方意见，让我们全程参加草拟农村工作文件稿的讨论。每次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前，都要求我们整理会议参阅材料，印发送给与会人员。会议期间，则派我们作为联络员，亲临各省会场点听取意见进行反馈。在 1983 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又派我任简报组组长。1983 年杜主任要我写了一段农业投资问题的草稿，被当年的一号文件所采纳。1983 年春，召开华北水利问题论证会，委派我当秘书组组长，负责写论证报告。1986 年 12 月，杜润生同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他指派我任秘书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和美国协议互派农业经济代表团到对方考察，1982 年冬，他派我带队到美国考察；1987 年批准我带队到巴基斯坦考察。

杜主任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就工作经常提出指导和批评；但他又很民主，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所以在他面前，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敢于畅所欲言地展开争论，心情很愉快，共同竭力做好各自工作。大家都很敬佩他。1987 年，我已 65 岁，退到第二线，不再担任联络室主任，但仍继续从事上述工作，直到 1989 年夏，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销，杜主任和我相继离休。在这十年间，我对杜主任和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情况比较了解，现仅就所知，谈谈杜主任如何开创农村改革新局面的。

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土地归属集体公有，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由集体统一分配。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经过几次调整，确立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制度，生产队为基本的所有、核算和生产单位；公社和大队两级也有部分所有权和经营权。这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适合中国情况、最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的制度，是最不能改变的。农民曾几次试图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瓦解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被压制下去。

在上述制度下，劳力和生产资料属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统一组织生产，集体参加劳动，劳动者没有自由；生产按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靠行政命令统一指挥，没有主动权；生产实行“以粮为纲”，集中力量搞粮食生产，不准从事离土经营，不准弃农经商，不准长途贩运；国家只允许农户有 5%--7% 的自留地，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如违反了“以粮为纲”，从事离土经营，多搞了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则要被取缔。

生产队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包括粮、棉、油等主要产品，都要由国家专业机构低价统购；其它产品也纳入派购范围，只能按规定的低价卖给收购部门。只允许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农村集镇的自由市场上出卖。国家通过统购派购形式，把农民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变为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积累，农民所得很少。当时，只准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能讲商品经济，更不能讲市场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开放市场，搞自由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分配上，实行工分制度，按出工人头记分（定额记分很烦琐，难以推行），年终按工分分配。由于没有激励机制，集体劳动中很多人出工不出力，生产又很单一，工分值很低。人多劳力少的家庭和缺乏劳力的家庭，往往买不回口粮。为了保证各家都有口粮，就出现不少“超分户”，相应出现“空分户”，从而形成平均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准搞其它副业，要抓“暴发富”，于是谁也不敢多生产，不敢致富。为了使城市能“安稳”地搞工业，城乡之间竖立起森严壁垒，采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把城乡隔离开来。农村人口非经过有限的指标和严格审批，是不能变为城镇人口，不准吃商品粮，不能在城镇就业和落户。由此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这种制度在理论上和想象上设计得很好，完全公有，按计划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集中全力搞农业，特别是搞粮食，必定会使农业兴旺粮食充裕，农业和工业都会得到很好发展。而实际上，却把众多的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和单一生产上，无法发挥劳力优势；将农民捆得很死，使他们没有自主权和自由权，以此也就没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完全的形式主义，乡村一派死气沉沉。

由于农村一下搞起集体经济，缺乏善于经营管理的干部，农民缺少文化，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农民出身的干部一下抓十几户、几十户人的全部生产和生活，大多管理不起来，生产队长能力又差，社员只能跟着受苦受累，而国家对农民抽得太多，使生活陷于困苦。在这样情况下，农村萧条，农业凋蔽，农民贫困就成为当时的现实。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长65.8%；粮食只增加58.1%。到1978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比1957年仅增加60.62元，平均每年只增长2.9%。其中货币收入不足10%。人均纯收入100元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3.3%。全国约有1.2亿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农村和农民迫切要求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农村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上的松动，鼓励很多地方的农民重新搞起包产到户，用来冲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纷纷由包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全国只有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支持搞包产到户。农民所以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形式冲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他们受到人身和发展经济的严重束缚，只有将它冲破，才能获得发展经济、广开门路的自主权，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各种资源，获得向多方发展的余地，因而它就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面对农民的要求，现实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时的领导和很多人存在传统的观念和认识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明确反对包产到到户，各省很多领导人和农委主任也反对包产到户。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农口干部座谈会，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会议，华国锋和王任重到会听取汇报并讲了话。会议主题是完善生产责任制问题。当时会上发生尖锐的对立和争论。安徽提出联产计酬，包产到组，责任到户或到人，但不一刀切，允许群众自由决定，此举遭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江苏提出，包工到组，联产

奖罚，但是下边大多实行包产到组，“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也到组，很难纠正。还有其他各种意见。这些争论的实质是在原有制度下改进经营管理还是改革集体经济制度，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改革集体经济制度的意见多来自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发涌动。主持会议的杜润生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不同意见，体悟广大农民的要求，考虑改革的动向。会议最后由华国锋讲话，他肯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把责任制限制在经营管理范围之内，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王任重的讲话基调与华国锋一致，提出我们要实行的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这次会议实际是一次反映下边情况和不同观点的会议，它没有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肯定了可以实行包产到组，对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就是对边远山区可以特殊例外。这在1979年9月经修改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作了如下的表述：“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这就显示出较多松动，不仅给包产到户开了口子，而且对包产到户的限制也由“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和了许多。这个规定一出，很多地方都说我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于是纷纷搞起包产到户。实际上我国农村很多位于山区，交通不便。于是包产到户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迅猛推开。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中将其进一步放宽为：“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里不仅给包产到户给予更大的范围，还给包干到户上了户口。因为包干到户是“交了国家的，交了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且简单易行，很快为农民所接受迅速推广。

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会议，杜润生主持会议。会上有两大争论：一是农业生产是否坚持“以粮为纲”？一是多种经营是否实行包产到户？会上反对“以粮为纲”、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很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杜润生打电话向在杭州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汇报情况，问及对包产到户应采取什么态度？王任重明确答复，“如果搞包产到户，还要国家农委做什么？”杜润生在最后作总结并向中央写报告时，强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不提“以粮为纲”，而提农业生产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提倡组织专业队实行专业承包，发展专

业组、专业户、专业工，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两者合计可达生产队土地面积的 15%。生产队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任务后，有权灵活安排种植面积，剩余产品有权自行处理。那时，杜润生同志是顶着上面的强风，按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谨慎艰难前进的。

1980 年 2 月至 8 月，中央领导层发生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变化。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万里为书记处书记之一，他们积极支持农村改革。5 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8 月调整了国务院领导，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紫阳出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从高层领导敞开了农村改革进展的大门，但来自其它方面的阻力还是不小。

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广东有一个地委领导说“谁搞包产到户就是历史的罪人。”广西很多地方开万人大会批斗搞包产到户的人，宣布他们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即使全国搞包产到户，我们这里也不搞。”并逮捕了一批搞包产到户的人。这种事情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可见阻力不小，但却抵挡不住群众的改革潮流，不少地方是群众要包，干部死顶，顶不住了就像水库垮坝那样，一下垮下来，干部撒手不管，出了不少乱子。到 1981 年底，全国农村已有 90% 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的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其它很多问题也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和激烈的争论。如：（1）是否允许农民购买拖拉机和汽车？有人说，这是大型生产资料，不能私有。（2）私人能否搞雇工经营？很多人尖锐地指出，雇工经营，就是雇佣劳动，就是搞资本主义，绝对不能容许。争论的范围很广、很激烈、时间很长。（3）农民能否搞商业，能否从事长途贩运？反对者也认为那是搞资本主义经营。（4）可否开放市场，自由买卖，让市场定价？很多人强烈反对，认为那是搞市场经济，会出现投机倒把、无政府状态，破坏计划经济，不能保证供给和稳定。（5）农村能否搞乡镇企业？有人说，那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挖国营企业的墙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浪费资源，是“一场灾难”。（6）农民是否能进城务工？城市很多人反对，说那是“盲流”，将冲击城市，“要紧闭城门”，“用铁扫帚把进城的农民扫

出去。”如此等等。总之，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反对和阻力，都存在着争论。要尽量减少反对者，排除各种障碍。

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制定的几个重要农村改革文件

1981年至1989年，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按中央指示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审时度势，主持制定了如下六个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文件。

（一）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号文件)，重点是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文件指出，我国农业必须坚持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长期不变。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农户承包的土地，必须依照合同规定从事生产，严禁在承包地上盖房、葬坟、起土。不准买卖、出租、转让、丢荒，无力经营或转营他业时应将土地退还集体。文件还写了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产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1983年1号文件)。突出点是，阐明农村中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指出我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文件共写了14个问题：（1）拟定农业发展规划及保证措施；（2）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3）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4）发展多样的合作经济；（5）改革人民公社体制；（6）雇工问题看看再说，允许农民购买农机和汽车；（7）改革商业体制和供销社，发展个体商业；（8）推进农业技术改造；（9）广辟农业资金来源；（10）建立一批农业生产基地；（11）更加放宽山区政策；（12）注意改变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的局面；（13）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14）培养提高干部队伍和素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号文件)。文件提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到十五年以上。文件分析了雇工情况，允许继续经营。发展多种合作。实行政

社分开。加强社会服务。商业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制止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发展乡村工业及林牧渔业。培养农村干部及建设人才。加强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

（四）《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 年 1 号文件)。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是：“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第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第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第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第六，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第七，放活农村金融。第八，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第九，经济技术交流。文件最后指出，“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放活经济之后，农民将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五）《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部署》(1986 年 1 号文件)。1985 年，农业出现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价作了不合理的调整，粮食总产减少，供应紧张，取消统购派购的意见没法实现，这暴露了我国农业还十分脆弱的缺陷。因而这个文件的重点是，强调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过去说农业靠政策、靠科学，现在增加一靠，靠投入，变成三靠)；把上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取消粮食统购改为计划定购。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完善流通体制和合作体制。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搞好扶贫工作，等等。随后，由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研中心牵头，联合农牧渔业部、水利电力部，起草了一个《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87 年 5 号文件)。发了上述五个 1 号文件以后，杜润生同志认为，不必年年发 1 号文件，可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多年性的指导文件，得到中央同意，便有了这一文件。主要内容是：(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2)继续改革统购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3)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4)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承包制；(5)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6)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7)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8)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9)有计划建立改革试验区。文件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这些文件反映了农村初期改革的过程，对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在中央领导的关照下，反映群众意见

和利益，总结群众的创造，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而产生出来的，是领导和群众互动的结果。

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就

在上述文件的指导下，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地开展。到 1989 年杜润生同志离休时，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十二方面。

（一）改变了农村的经营体制。农村改革开始时，只说是完善集体经济下的责任制，发展的结果实际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制度，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变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制度。即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所有(定为村集体所有)，把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地不得买卖、盖房、葬坟或作非农使用；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自主自愿有偿流转，可以入股。农户有土地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独立自主经营权，产品支配权，成为独立的基层生产单位。村一级也可以有集体经营，尽力为家庭经营服务，从而形成双层经营。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大部分村没有集体财产和企业，没有能力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只起管理土地的作用，变成分散的家庭经营；有一部分村有集体财产和企业，能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成为真正的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有很少单位（约数千个）以统一经营为主，统一计划、统一安排工作、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林业体制也改变了森工和营林分属工业与农业“两张皮”的矛盾，统一为一个单位，并且逐步将集体林地和林木承包到户经营。实行家庭自主经营后，农村出现一系列的变化。

（二）农村涌现出多种所有制经济。随着家庭经营的发展，农村打破了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经营方式，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国家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联合所有制经济、私人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外资经济等。经营方式有：个体经营、集体经营、合伙经营、雇工经营、合作社、股份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综合经营（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个企业是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开展多种经营后，粮食生产仍然是重要的项目，所占的耕地最多，但增加值比重显著下降。棉花、油料、烟草仍占有重要的位置；大量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作物。在大农业中，发展最多的是畜牧业（包括蛋、奶）和水产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从增加值来看，牧业、水产业逐步上升到农业的重要位置，林业也得到很大发展。

（四）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以生产日用工业品和为农业、大工业服务为主的乡镇企业即二产

业大量发展，使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中主要是工业，不少地方其增加值占到当地农村增加值的主要方面，使工业成为主要产业，使乡村逐渐走向工业化。

（五）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使劳动力结构也随之变化，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转入非农产业，成为农村工人。

（六）经营单位面向市场生产，国家不再给各生产单位下达生产计划。生产队除了国家规定的计划定购任务外，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非农产业完全按市场需要生产，产品送到市场上出售，由市场形成价格。农村不仅有农产品市场、日用品市场、小商品市场，而且有生产资料市场等。开放后的市场并没有如一些人所说出现严重危机，而是日益繁荣，商品琳琅满目。农村同样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出口农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还有劳力外出和对外包工。政府则搞好市场管理，取缔不法行为，保障市场稳定。

（七）分配方式多样化。随着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分配方式也呈多样化，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投资赢利、利息等）、按其它生产要素分配多种。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八）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原公社区域建乡政权，行使行政工作。原大队一级变为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经济工作则成立社区经济合作社（很多地方没有挂牌成立，由村委会管理）。原生产队大多改为村民小组，也有保留生产队名称的。

（九）农村生产的技术构成逐步变化。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土壤改良、盐碱地治理等）建设，普遍推广良种和新技术，化肥、农药得到合理使用，防治病虫害的力度加强，农机大量增加。非农产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经营管理，增加科技人员，提高劳动者素质，产品不断升级。部分农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大力防治对水资源、土地和空气的污染。搞好草场生态建设，注意对水土流失、沙化、荒漠化、石漠化，鼠害、虫害的治理。

（十）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5 年粮产量达到 37911 万吨，比 1978 年增加 24.4%，1990 年达 44624 万吨，比 1978 年增加 46.4%。农产品做到保证国内供应，还可以出口；乡镇企业产品的出口更多。1989 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 14480.17 亿元，为 1980 年的 5 倍多。

（十一）城乡关系开始松动。农民进城务工的人数日益增加，为农民进城务工的中介服务机构

不断出现，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农民开始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有的在原有小城镇的基础上扩大，有的在村的基础上新建，如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

（十二）农村人民生活改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村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整体来说，农村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穿着、居住条件大为改善。198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601.5元。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带、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温州地区、闽东南、潮汕地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当地居民日趋富裕。内地也出现了一些富裕的人。中央虽然努力加强扶贫工作，但全国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的人，还占到家庭总户数的15.52%。

在农村改革中大好形势下，出现了不少创新

（一）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分离，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把经营使用权承包到农户，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弹性，既适应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也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走向现代化。

（二）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合力的好处，形成万马奔腾，蓬勃发展的势头。

（三）以发展多种经营为基础，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成长为市场经济。

（四）发挥农村劳动力多的优势，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多余农业劳动力，并使部分农村工业化，形成城乡工业双轨发展、比翼齐飞的活跃局面，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

（五）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与城镇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六）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有序地动员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逐步把农民转变成工人和城市居民，实现农民的历史性转变。

（七）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正处于农村改革的初始阶段，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解决。由于遇到种种阻力和客观存在的困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如：健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发展各种合作与联合，完全取消统购派购制度，真正转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搞好市场建设，改革城乡关系，改变工农关系，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搞好农村民主建设、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其后都在逐步解决或正在努力解决之中。应该讲，这十年改革取得的成果，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杜润生同志在具体领导农村改革工作中，面对严重的阻力和重重矛盾以及巨大的困难，所以能够破浪前进，稳步推开，取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他在领导工作中具有优良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一）能够深刻体会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尊重农民的行动和创造，又不局限于农民的自发运动，善于将其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同时，将领导的意图和群众要求相结合，形成正确的政策方针，用以指导改革实践，推动农村改革向前发展。对此，杜润生同志将它说成是“群众和领导的互动”。很多人说：“杜老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一点也不错。他经常告戒我们下乡调查，要多到贫苦困难的地方去，深入群众，多听群众的意见，真正为群众办事，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信任，是最大的荣誉。

（二）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急于批评和作结论，善于在矛盾对立中寻求共同点，形成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意见，以群众的力量和实践的结果，耐心地一步步将农村改革引向前进，达到预定目的。例如，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明显存在两种尖锐对立意见，而坚持集体经济的人，确认也要搞好经营管理中的责任制；主张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人，同样承认责任制。杜润生同志便抓住这个共同点，以完善责任制作为题目，把小段包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等等，都作为责任制的不同形式，让农民去选择，让实践去检验那一种效果最好，在群众的行动和实践面前，逐步解决争论以推进改革。又如私人雇工问题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和争论，但争论各方经过深入调查和讨论，得到一点共识：允许其发展利多于弊，于是便确定暂时搁置看看再说，之后的实践结果则减少和结束了各方面的争论。

（三）允许分区决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沿海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西部甘肃、云贵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相差甚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中的集体经济实力较大，而贫困地区很多村则没有集体财产和无集体经营（一般称为“空壳村”），从而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意见，很难完全统一。杜润生同志很清楚并正视这种实际情况，主张不能一刀切，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大统一下允许差异，允许分区决策。这既符合实际，又可以解决对立和纷争。

（四）重视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此开展论证。每个重要文件在写出之前，除了听取领导的指示外，均动员研究室全体人员和各方面的力量，赴农村调查了解基层存在的问题。回来汇报讨论后，确定撰写的主要问题，再组织力量作专题调查研究，有争议或拿不准的问题，便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召开论证会，有的问题（如雇工、取消统购派购、开放市场等）还多次召开论证会。动员调查讨论的人员很广泛，除了本单位的以外，还有在京各研究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口各部政策法规司、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大专院校（主要是农学院和农经系）的师生，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学术团体，以及各省市的农村研究单位、部分院校及部分农村工作人员等等，队伍庞大，人员众多，可以说能动员的人都动员了。因此，每个文件的形成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真正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符合实际，不出大的差错。

（五）注意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虚心听取各类意见。杜润生同志从不排斥各种抱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而是诚恳地团结共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原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坚持农业集体化的观点，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人观点明显对立。但是，每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都请李友九参加，草拟出的农村工作文件，都请他审阅修改。编写《中国农业合作化史》，也请李友九作主要审稿人。1986年12月，中国农经学会选举杜润生为理事长，他极力推举李友九为常务副理事长，经常共同研究工作。他对我们说：“经常听一些对立面的意见有好处，有些反对意见也有道理，耳边有不同的声音会使你清醒。”

（六）放手让下面的干部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对研究室的同志在工作上要求很严格，但又放手让他们独立工作，鼓励大家大胆提出意见，发挥创造性。出现问题时则善意指正，有缺点错误时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从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杜”，都愿与他共同工作。他曾经对我们说：“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能发挥本单位人员的积极性，这个单位的工作成绩就不会受本单位领导人水平的限制。”这是重要的领导工作法宝，给我们以深刻教育。

（七）重视培养年轻干部。杜润生同志认为青年人没有保守思想，善于接受新思潮，发现新事物，勇于创新，敢往前闯，是改革的重要力量。在建立农村政策研究室时，他就提出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提拔青年干部翁永曦为副主任。积极支持青年人组织“农村发展所”，鼓励他们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一起研究问题，吸收他们参加农村改革文件的起草和讨论，

培养了一批青年的农村问题专家。

（八）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在探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同志很留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消灭城乡对立的理论，以及列宁《论合作制》等文章。他不时要我查找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书籍材料给他参考。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与农科院合作，同时请一些单位参加，扩充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尤为注重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情况，每个文件发出后，都组织人员到下边了解执行的情况和实际效果，包括农民的反应、生产发展、经济动态、农村变化、农民收入、所引发的问题等等，采用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稳步前进，用实践来检验政策和改革的当否性。

由于杜润生同志在中央领导下的正确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农村改革虽然遇到很大的阻力和种种困难，但取得了胜利性的突破，逐步往前推进，没有发生重大偏差，

晚年继续关心“三农”问题

1989年夏，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后，杜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仍始终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关心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搞好农村民主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他参加各种有关的研讨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采访，诚恳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97年底，在农村改革将届二十周年之际，他召集了一些同志商议主编了《中国农村改革决策记事》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随后又写了《农村体制改革回眸》（回忆录）；2008年出版了《杜润生文集》（收集了1980—2008年的讲话和文章）。在一些同志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杜润生基金会”，定期评奖农村问题研究的优秀成果，已举行多届，奖励了一批优秀成果和人才，推动了农村问题的研究。杜润生同志不愧为我国农村问题的泰斗。

杜老因病住院期间，我曾几次到医院探望他。但10月23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时，我却因病再入医院，医生不许离床，未能参加，深以为憾，留下不尽的哀思。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润生同志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第六届财新峰会中“杜润生与中国农村改革”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郭书田

由财新传媒举办的“第六届财新峰会”中，召开“杜润生与中国农村改革”专题讨论会，这是在杜老去世不到一个月与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是全面不能有遗漏；二是建成是完成式，不是进行式，也可以说是硬任务、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不能有例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形象指出的那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讨论“杜润生与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以深情厚谊怀念杜老的农业思想和在农村改革中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研究实现农村小康目标中，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纵观杜老的一生是与农民和农村打交道的一生，也就是与农民同生死共患难的一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与农民战斗在一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与农民同呼吸渡难关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路线指引下，全力支持农民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总结农民创造的经验，形成中央的决策，一步接着一步推进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有两篇杜老亲自写的文章，全面论述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一篇是在1995年写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追忆一九五五年合作化大辩论》；另一篇是在2008年已95高龄时写的《中国农村改革漫忆》。

回顾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农民的五大创造，都是在杜老的直接关注与支持下，冲破一个又一个阻力取得成功的。一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也就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不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包产到户），到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的75号文件提出在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开了一个口子。之后，再到中央5个1号文件，由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也就是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是农民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发展，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到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再到永远不变，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农民不再流传“共产党的恩情像太

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谚语。虽在中间也有过一些起伏（如1989年的“六四”），但这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这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二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开始称社队企业），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新路，是在排除“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与“不正之风的风源”的强大非议中走过来的，产供销全部是由市场调节的，是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先导力量”，形成乡办、村办、个体、私营“四轮驱动”，和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五业并举”，以及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格局，涌现出一批以鲁冠球为代表走向国际的农民企业家。一位外国元首说，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在村级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民主”，开创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先河，改变了在人民公社解体 and 建立了乡镇政府后，在村级设置村公所的做法。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参观一个村民主选举的全过程后说，这是农民找到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诀窍。四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潮，冲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以及被指责为盲流，有2.7亿青壮年农民成为城镇建设与服务的大军，使城镇化率超过50%，而“农转非”的成本是自己承担的。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超过经营性收入，位居第一。五是农产品的购销制度，由统购统销到“死一块、活一块”的“双轨制”，再到购销价格完全放开，走上市场化的轨道。以上这五项全局性重大改革，不仅使农村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带动了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杜老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团队，在这五项改革中，一直走在第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中央的决策，发挥了积极引导与有力推动改革作用。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阶段，农村改革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上层建筑，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可以从杜老的农业思想中找到解决的途径。一是土地制度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改革以来，农民获得了承包经营权，解放了生产力，但集体所有权农民的主体地位是“虚化”的。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实行股份制形式，还权于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主体地位“虚化”问题；同时延长农业的生产链，推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使农民分享增值效益，增加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要深化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改革，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解决处于垄断地位与以地生财问题，真正

做到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这项改革，大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有助于从权力制度上消除“小官巨腐”现象。二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但自 1984 年达到 1.7:1 的最低点以后，一直逐步扩大，到 2010 年达到 3.33: 1，成为历史上最高点，基尼系数高达 0.47。最近四年，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市民，城乡差距虽有所缩小，2014 年为 2.9:1，每年下降 0.1 点。照此速度到 2020 年实现小康目标时，城乡差别仍高达 2.3:1。虽然如按平均数计算或城乡分别计算，在 2010 年基础上实现翻番目标可以实现，而城乡差别仍居高位，需要降低，否则容易产生“中等收入陷阱”。三是粮食安全问题。2004 年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而且逐年上升。2014 年粮食进口量已高达 1 亿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 1/6。今年粮食生产“十二连增”，而进口数量仍在增加，使市场粮价大幅下跌，严重影响农民收入。适当利用国际资源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头，陷入被动困境。四是消除贫困问题。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成绩很大，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我们的脱贫标准是很低的（人均收入 2300 元，日消费为 1 美元），如按现行国际标准（日消费 1.25 美元）计算，其贫困人口要超过 7000 万人。按现行标准计算，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 2 万元以上相比，仅为他们的 1/10，为全国农民人均 1 万元的 1/4，差别太大，不利于社会稳定。中央已将 1.25 美元的目标确定在 2030 年实现，需要有新的重大措施。五是农民工问题。一方面是现有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即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在成为城镇户口时不改变土地承包权；另一方面每年新增 1000 万农民转为市民的妥善安置，这自然会继续出现农业副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不利农业现代化。在加速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中（目前为 36%），通过发展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以及农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素质，解决老龄化和由谁种地问题，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经营收入，使农业真正成为有效益的产业。同时要加强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目前为 56%），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还要欢迎并积极支持有经济与技术实力的农民企业家返乡第二次创业。在“十三五”计划中，解决上述农村面临的五大问题，在杜老的遗作中都能看到解决的思路。把杜老的农业思想融入到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之中，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新的生产力，是对杜老最好的怀念。

杜老的一生与中国农民心连心，他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农民的解放与获得权益排除万难，奋斗不息终生。他把维护农民的权益作为研究与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足迹与墨迹，永远铭刻在农民心中；他留下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千古不朽。同历史上许多

伟人一样，自然也有未能如愿的缺憾，载入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史册，相信会有后来者跟踪践行。让杜老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作者系农业部原政策体改司司长）

新中国以来历年的农业大事记

吴天锡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据史书记载和各地出土文物显示，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已孕育农业，栽种作物、饲养家畜和制作简单的农用及运输工具，逐渐形成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和华夏文化。但近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及剥削，农村经济发展凋敝，农业生产迟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损伤，农村土地制度也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富阶级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90%的贫困农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以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一、1950—1954 年的创始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解放区内，党领导农民以农会、农协等形式组织起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农民负担。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群众运动，没收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为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七亿多亩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但绝大多数贫困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仍然严重不足，几户人合养一头耕畜，几户人共用一辆车、船，恢复生产仍有困难；于是一些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生产。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引导农民，坚持“自愿、互利”政策，组织起来，生产互助合作，由互助组、合作社逐步发展到以按劳分配为主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又组织各地农业劳模到苏联去参观、学习办社经验。1953年原中宣部负责人范长江

率农业部、山西省委农工部等单位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山西平顺川底村总结办社经营管理经验，介绍该社划分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在收益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原则等一套经营管理经验，之后在山西等各地广为推行。同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到1954年，全国已有七千多万农户参加了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0%），合作生产，共同发展。

新中国初期，要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还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粮棉生产。1951年，山西劳模李顺达在天津“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上答记者问，两名西方记者质询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将会被人民推翻...”，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和不满，事后他约请与会其他外地农业劳模一齐发起“爱国增产”的挑战竞赛运动，大力推广先进的增产技术，积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产粮棉。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粮棉高产模范（如：山西棉花劳模曲耀离、江苏水稻劳模陈永康等）；各地都培育了一批先进社队，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起着带头作用，以点带面，再次形成群众性农业增产运动。到1959年，我国粮食总产达3208亿市斤，皮棉总产2129万市担，均已突破之前最高年产量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农业产量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水平只用了四年时间，而欧洲战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才超过历史最高产量水平”。“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归功于政策适宜和群众真正参与、组织起来了”。

一段时期内，各地战乱相继平息，人民政权建立，农村生产秩序恢复。但基本建设设施长年失修，自然灾害仍然频频发生，从1950—1954年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的水旱灾害，虫灾和其它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生产救灾成为当时急务。国家在财力薄弱、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依靠和组织群众进行了淮河治理、扑灭飞蝗和赈济中原霜害（1953年）等大量生产救灾工作。同时，大量复员军人和失业人员亟待安排，中央采取“屯田戍边”政策，在边远国土上兴办国营农场，开发荒地。到1952年，全国就已建成562个国营农场，安置职工近40万人，开垦荒地565万亩，种植天然橡胶90万亩，不仅养活了众多人口，而且还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日需生活产品。这一段时期中，各地农村还普遍反映，畜力衰退，动力不足。农业畜牧业部门提出：“保护现有耕畜，奖励繁殖，防治兽疫”的方针，禁屠、奖殖，大家畜由1949年的5947万头，发展到1952年的7617万头，缓解了广大农村畜力不足问题。同时，牧区推行慎重稳进方针，“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稳定牧区生产秩序。在这段时期内，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先进农具，增加农业投资和贷款，整顿农业科教体系

等方面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沿江沿海的水产事业也由专人管理发展到建立专门机构，加强了管理。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大行政区，分别管辖各大行政区内的省（市）、地、县级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农业部，任命李书城为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为副部长。各大行政区均设有农林部分管属下各省、市、县的农林业务工作部门。农业部还配有苏联顾问，着重农垦、畜牧、农机等方面的协理工作。到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农业恢复并已开始发展，五年计划开始推行。在新形势下，撤销大区一级，各大区农林部人员下放各省、市或上调中央农业部，加强了中央农业部的工作。廖鲁言出任农业部部长，着手整顿和加强全国农业队伍，增拨专项经费，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经营管理辅导站、畜牧兽医站，把国家农业政策、计划和技术直接贯彻到农村基层。

二、1955—1962年的结构调整时期

1955年农业的大事频发。年初，党中央和部分省、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商定了十七条意见，经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商讨，补充修改，扩充为《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40条”），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修正后公布。纲要主要内容是，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全国分区采取措施，争取用12年时间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经济作物、畜牧、水产和林业生产；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商业、交通、信用和文教、卫生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年七月，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上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变。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1955年6月，全国入社农户只占农村总户数的14%，年底达到60%，到1956年底，入社总农户已占到96.3%，其中高级社农户占总数的87.8%，比预订计划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在全国人代会上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

1957年，各地农业部门和科研教育单位，在总结农业增产经验的基础上，把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措施，归纳为“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八个字，广为宣传和贯彻。这一年的下半

年，农村出现了大修水利、大积农肥的群众运动，几千万农村劳力投入田间劳动，创建了大面积的“丰产田”和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缺乏科学设计与合理的组织，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1958年1月，中央在广西南宁召集九省、二市党委书记会议，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要求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之后又继续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大跃进”等口号，推动农业的加速和发展，但急躁、冒进的情绪，浮夸、虚荣的作风，一时得以普遍流行，许多地方以人海战术大搞“丰产田建设”，大建“万头猪场”，滥伐树木大炼钢铁；许多地方办起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放开肚皮吃饭……结果是耗损了地力的现有耕地，生产不出计划中“增产”的粮食。196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恢复到1.7亿吨，但仍只是1954年时的产量水平，人们吃尽了许多年来积蓄储备的粮食，只好以瓜、菜代替主食，全民的食物营养水平大幅下降，饥饿重现，贫困再生。据我当时先后在四川、安徽、甘肃、黑龙江等地调查，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大量流行；许多适龄妇女因劳动过重，子宫脱垂，而暂时不能生育，以致一度出现人口减少现象；许多地方滥伐森林，垦殖荒山，以致水土流失严重现象重又出现。中央对这些问题早有察觉，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原则下，采取了一些改善措施，缓解了农业倒退现象。1962年中期，中央在北戴河会上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农业发展才又重新回到积极、稳步发展的道路上。

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1.5亿吨，大体上相当于新中国初期水平，整个农业生产仍处于衰退之中，教训十分深刻。

三、1963—1978年全国农业从恢复走向稳步发展时期

1963年，农业部下乡工作人员碰到了一个“吃饭不收粮票而把肚子吃得饱的典型社”——山西昔阳的大寨村。情况汇报给了廖鲁言部长，他立即去大寨蹲点调查，总结了大寨人民团结一致，勤劳生产，建成基本农田（大寨人称为“海绵地”），把穷山村改造成小康村的经验。1964年，大寨书记陈永贵被请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党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中央和山西等有关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参观和现场会；大寨人也应邀到各地传授经验，许多地方培育了自己的典型（如江苏华西、河南南街等），就地推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群众被振奋发动起来；许多地方学习大寨建设基本农田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兴起了治山治水活动；许多地方推广了大寨民

主管理、“现场会”等具体经验，改善了地方领导作风和方法。总的说来，教育了群众，振奋了干劲，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当时正在深入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紧密结合，“四清”运动着重整顿农村基层工作和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四清运动中暴露出：农村基层领导薄弱，集体经济的优越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和应有的效果，而大寨的经验正好弥补了以上的缺点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未深入农村，但大批农业干部经历运动，到干校劳动锻炼，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村的基层工作，一时形成放任自流。但在城市骚乱、工厂歇业的情况下，一批职工回乡支援农业建设，带动了农村工、副业的大发展，使为农业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社办工厂大量兴起，个体经营活动和家庭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农村集市交易活动也处在恢复和发展中，农村经济趋于繁荣。

70年代初期，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和农业部加强了联系，互派代表设处开展工作；中国农业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并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考察“取经”，农业的国际合作工作日益开展；国际资金和人员来华帮助我国开展一些农、林和水产建设项目，有益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1974年，欧美和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粮食危机”，77国集团主席布迈丁（阿尔及利亚总理）正式照会我国，要求我国派团参加世界粮食会议，以对付缺粮、饥饿问题。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有关会议，宣传了“自力更生”观点，并量力对外承担了农业援助任务。在文革时期，国家农业机构也有较大的变动。1968—1969年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农业部只留下20—30人应付日常业务。1971年，农林口内各部在军代表监管下合并为农林部，开始召回下放干部。以后又分设农、林、水产、农垦等部；不到一年以后，水产、农垦等又回到农业部，恢复了文革前的工作体制。这一段时期，虽历经动乱，但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下，没有中断过业务，而且在恢复到正常情况的同时，还开展了农业的国际合作事业。农业生产仍正常进行，生产有所发展。全国粮食总产由1963年的1.7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4亿吨；农业的多种经营也有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1963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458亿元，但同期全国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仍没有多大的增长。

四、1979—1996 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积累的经济矛盾，尤其是持续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粮食生产仍有不足，棉、油等生产也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投资基本上没有提高……。

面对这些问题，中央和各有关机构、专业人员经过深入探讨，提出“以调整为中心，包括改革、整顿、提高的新方针”。着重调整农业政策，先后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文件，主要是：维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援；提高粮、棉、油等 18 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机、化肥、农药等销售价格；减免部分社队企业税收等。其中特别提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和必要的奖惩制度”；并规定“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到 1979 年冬季，安徽、四川等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总队数的 60% 左右；到 1980 年 3 月全国 80% 的队实现了“包产到组”。安徽在特大旱灾导致严重减产的形势下，还试行了“包产到户”。

1980 年 4 月，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的文章，指出：“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召集座谈会，集中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形成 75 号文件，明确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今年年底，全国已有 50% 的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1982 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 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明确肯定“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完善联产承包制的关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截至年底，全国 99.5% 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分期分批实行，到 1985 年完成了整个农业基层组织的重大变革。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实行了 27 年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活动。1979 年，恢复了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1982 年，开始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的办法；国务院还批准其他一、二类商品，在完成统派购任务和所有的三类商品一样地议购议销。1983 年，农业进入更大规模的开发计划期，国家有计划地建设了

254 个商品粮基地县，74 个优质棉基地县，113 个优质农产品基地县，278 个名优农产品基地和 490 个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1985 年，废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开始按“有调有放，调放结合”原则，放开购销价格，由市场调节。1986 通过改善交通、饮水、通讯、供电等活动开展扶贫和发展山区经济。1987 提出“丰收计划”和“粮、棉、油的菜篮子工程”；改革农业科学和教育体制，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综合发展。同年，还先后建立了 30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为农村改革发展探索经验。1981 年 6 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世界粮食理事会年会在北京召开，36 个理事国的农业部部长参加，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会议讲话，大会“通过农村综合发展，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北京宣言》，并组织了参观。1991 年，遭受重大灾害后再度大兴水利建设。1994 年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农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城乡市场和对外贸易做出了贡献。

这一阶段，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农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增加了投入，战胜了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取得粮、棉等作物的持续增产，多种经营遍地开花，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再造辉煌，全国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成就是相当大的。但人口增长、生活改善后需求增大，对于有限的农业资源利用的压力也在增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出打工……，这些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五、1997—2004 年城镇化推动农村结构改革时期

1997 年后，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国家强调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稳定粮、棉种植面积，推行“种子工程”、地膜覆盖、合理施肥等新技术措施；加强农业基层干部培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1998 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先后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生产救灾成为当时第一要务。

2000 年，国家提出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调整。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和出口农业”；加快发展畜牧、水产、农产品加工等业；推行“专业合作经济”和“公司 + 农户”等产业化经营；切实保护耕地，加快小城镇发展。

2001 年，国家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发展畜牧、水产和林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产业经营，努力提高农业的后续效益。

2003 年，在总结上个五年计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切实加快畜牧、水产和林业的发展，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大量农民从利用农闲进城打工逐步发展到牵家带口、进城转业；每年春节前后，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然后再续返城，一时造成交通紧张状况。同时，也出现了农民回乡投资修建小城镇的趋向。

这一时期，我国“西部大开发”开始发力；农村多种经营全面开花，粮食自给程度也有提高；城镇化推动“以农济工、以工补农、城乡并进”的新局面。但同期人口持续增长，有限的耕地又屡被占用，人地比例不适现象日趋严重，促使今后农业的持续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六、2005—2015 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农业发展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向前进。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迫切要求逐步加以改善。近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农村建设经验，也有一定的财力；在广大农村中已先后出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江苏江阴市华西村、河南临颖南街村等新农村建设典型。我们有条件继续稳步前进，争取早日实现农村小康的目标。在这个形势下，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我国当前的要务，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趋向。在北欧靠近原苏联一带，在南斯拉夫、塞浦路斯和韩国都有尝试。有的还提出：“要通过建设，消灭三个差别”，我们对此曾做过一些考察，农村社会经济情况虽有一点改善，但大多因为财力不济、社会关注不够和协助不力等原因，而没有坚持下来。

2006—2008 年，世界多数国家先后出现“农业危机”，生产停滞，流通不畅。经过联合国有关单位和许多国家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提出“集约式现代化农业模式”的设想，并在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试点推行；美国的家庭农场也在买卖土地、雇工经营方面，开始走向集约式的规模经营。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形势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走向更大的变

革和发展之中。

（作者系农业部原国际合作司教授级高级经济师、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原理事）

我国农业当前面临的巨大转变

卢 文

我国经济建设正在全面协调地进行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当前正面临着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按照农民的意愿，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政社分开，成立村的社区合作组织；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开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长期承包给农户经营，建立以农户经营为基础和社区集体经济相结合的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作为基本的经营制度（实际多数村社没有什么集体经营的企业，只起土地管理、发包、监督承包经营的作用），集体森林也承包到户经营；鼓励农户发展多种经营，发展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以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经营方式；取消统购、派购，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允许农民在各种产业间、地区间、城乡间流动转移和入城务工；让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改革城乡隔离制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给农业以多种补贴；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等等。通过这些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多方面发展生产，使农村出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近年来，又进一步提出，把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让经营权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可以转包、入股、出租、互换、转让，便于扩大经营规模，建立各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合作和联合经营，利于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应用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走向现代化。

前段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粮食连年增产，农林牧副渔各业蓬勃发展，有 2.6 亿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促进了全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也遇到新的问题：（1）农业分户承包经营后，形成分散的小生产状态，不利于机械化和新科技的应用，浪费劳力和资源，生产成本低，效益较低，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益。目前，我国粮食、大豆的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缺乏竞争能力，不适应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2）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供给，由过剩走向短缺。而农业规模小，难以实现机械化和使用较先进的新科技，以致农业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益少。越是这样，劳动力就越要离开农业，农业劳动力就越短缺，变成“老头农业”、“妇女农业”。要使农业提高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较好的赢利，就要转向以资本代替劳力，改善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信息化和使用其他科学技术，就必须改变分散的小生产状态，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使经营者的收益达到或略高于进城务工平均收益的水平，务农劳动力才能稳定。（3）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大、要求质量高，农业生产的粗放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加重，资源透支，污染严重，对生态破坏很大，使生态环境恶化，难以保持持续发展，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因此，农业发展方式必须实行如下几方面的转变：

第一，改变农业的粗放生产状态。要增加投入，搞好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同时推广节水技术；要改良土壤，改良盐碱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包括高质水平梯田），减少中低产田；要全面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推广信息化，提高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要推进农业机械化，完善农村交通运输，提高生产能力，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要扩大生产门路，深入开发山区、草原、海洋，进一步发展林、牧、渔（特别是远洋渔业）等各种产业；要加强对农产品的安全监督检查。总之，要努力发展精细、高产、优质、高效、安全农业。

第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要进一步搞好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完善土地市场，通过经营权的转包、入股、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实现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便于实现机械化，更好使用新科技，搞好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要多方支持发展种田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委托经营等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包括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民），特别要发展以有实力的经济实体为龙头、联合各有关部门实行一条龙经营的、把企业和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产业化经营集团，以此建立起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搞活农村金融，发展合作金融组织，加强对农业经营组织的各种服务。这些都要靠农民的自觉自愿，要尊重农民利益，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成长，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靠行政手段加以强制，绝不能损害农民利益。欢迎倡导城

市的企业和科研单位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创新生产经营体系，但要防止一些单位到农村占地搞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的经营，或者把农民变成雇工；防止把土地非农化。必须看到，我国由于人均耕地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传统影响很深，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即使顺利流转，各地（特别是山地和贫困区）仍将会有大量的土地独户经营。对这种小农户，不能强行消灭，也不能歧视，应该对他们建立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如水利、科技、种子、农机、运输、加工、销售、金融、土地委托管理等，使他们与大市场及现代科技联结起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改变分散落后状态。

第三，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极力保护和节约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发展循环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努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沼气等，多方利用可再生、清洁的自然能源；广为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植被，加强山区、草原建设，发展优质人工草场，增加良种牲畜；降低能耗，防止和减少废物排放，淘汰高耗、高排及污染企业，减少化肥、农药、塑料制品对土质的损害，多施有机肥，减少和消除对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对已受污染的水资源、土地和空气要努力治理，大规模整治水土流失、沙化、石漠化；过去开发不当的，坚决退耕还林、还草、还牧、还湖；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特色农业；保护野生动物，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和谐持续发展；严惩破坏生态的单位和人员，把生态建设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使农业生态环境趋向好转。

第四，培养新一代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人，有新的生产者才能营造新农业，新的农业也会造就出新的生产者，两者在互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相互促进。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增加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学会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对现代农业生产的操作。通过学习与实践，锻炼成为有文化、有经济头脑、有科学知识、有生产技能、有经营管理能力的新一代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人。

有人说，中国农业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田大多用于种植效益不高的粮食，主张放弃以粮食生产为主，大量进口所需的粮食，把农田改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或用于非农项目，以增加收益。这种意见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吃饭问题是个生死存亡问题，饭碗如果卡在别人的手上，就得听命于人，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我国有 13 亿人口，需要的粮食数量惊人，对世界粮食市场压力很大，难以供给；也会给一些缺粮国家造成严重打击；国际粮食市场一旦发生波动，我国经济就会受到巨大的震动；大量进口粮食，运输也是一大难题。因而，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种粮养活自己。如果发展适当的规模经营，推广精细农业，提高科技水平，实行农业机械化，搞好经营管理，就可以增加粮食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是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

要实现上述四方面的转变，政府财政必须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农村的资金应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发动城市的企业到农村去搞农业；城市应在资金、科技、人才、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运输、加工、销售、对外联系等方面支援农业；科技部门要加强农业方面的力量，多方帮助农业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这需要多方面协调、作艰苦的努力，而且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估计要到建国一百周年，才能完成这一根本的转变。

（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生态经济生物资源系统建设问题

——一个历经 20 余年的研究实验报告

任荣荣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科学理论思考

国家反复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按科学规律建设“三农”生态经济资源系统并使其健康发展的问題，也就是社会农业劳动生产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相配套的问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富饶的生物资源，如有上述三大条件，国强民富就有了保障基础。

其实中央早看到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人、山、水、林、田、湖是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2014 年 12 月 23—24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讲话：“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这是给全国人民的警钟啊！中国的“三农”问题讲了一二十年，可是至今依然故我，为什么？就是生态经济生物资源库出了问题。

从生态系统科学层面上看，也就是第一生产者、第一消费者、第一分解者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循环。第一生产者植物依靠太阳进行光合作用生产有机物；第一消费者人和动物利用第一生产者的产品维持其生命活动；第一分解者微生物分解第一生产者、第一消费者的遗体、残体和排泄物，作为自身生存繁殖的营养，进而生产创造第一生产者所需的营养和生存环境条件。三者之间进行相互的可持续的自然生态循环。这就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界最基本的科学的生物循环规律，中断或破坏这种科学规律则沦为反科学的范畴。人类必然自食其果，这是科学真理，决不可违背，可谓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就认识到这个科学规律，《管子》八观中两段文章即是佐证：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它的耕耘情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们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们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

二、中国“三农”问题剖析

当今中国“三农”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进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现状。

1、生物经济资源遽降，浪费严重。农民人均农业资源，如土地、水、劳动力资源每况愈下。60多年中，耕地、山林、草原资源（数量和质量）急遽退化；农业的命脉水资源的人均数量和质量急遽下降，至今没有根本性的解决良法；农业劳动力资源急遽萎缩。

在人均资源减少的前提下，理当更应珍惜资源、保护资源、培育资源，更应遵循自然界的生物循环规律，结果是反其道而行之。农药份量越来越重，钱财浪费越来越多，成本也越来越高。造成

土壤酸、瘠、板、毒越来越严重，由此带来的面源污染也与日俱增。

要解决农业资源不足的问题，根本的就是要如前可述，遵循生态系统的平衡法则，就是使三个“第一”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趋于输出输入的平衡之中。

2、违背科学之道，反科学手段恶性膨胀。几千年的中国农业史告诉我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有自然物种的形成都是自然界长期的选择结果。它们适应于相应的环境和水土条件，继而能持续生产出人类所需要食物和畜牧、水产业所需要的饲料和其它资料，亦即要有相应的优良物种，相应的优质水肥和优质土地。

作为优质耕地的条件，必须也是一个健康有序的土壤社会。在这个土壤社会中，作为生命体的微生物和相应的软体动物需要拥有充足的腐殖质，而这些生物又把赖以生存的腐殖质转化为疏松而营养丰富的土壤。几十年来我们往往无视此规律，反而剿杀了土壤中的生命体（软体动物和微生物），将无机肥取代有机肥的同时滥施农药，把土壤仅仅作作为植物生长的一个生命活动微弱的载体和贮存有毒物质的地下“仓库”。目前，中国 18 亿亩耕地已经有 3 亿亩严重中毒，其余 15 亿亩软体动物、微生物也基本灭绝殆尽，而且态势还在发展之中。这种状况如果再不加以制止、遏制，后果极其可怕！有人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必须分开讲。科学是正道、大道，是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可以解释为生产力。技术就是手段、技巧，有其两面性，同时具有正能量和负能量。农业上的化肥和农药是技术成果，滥施化肥农药则是对土壤的一种反动行为，就成了负能量。

3、挖肉补疮饮鸩止渴。我国东北大豆业崩溃了，为解决油脂和蛋白质饲料的需要，国家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造成中国粮食、饲料的自给率连年下降。2012 年为 90%，2014 年为 87%，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留下了令人忧虑的后患。长此下去，中国有 14 亿人口（2014 年为 13.6 亿），国内如果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举国粮荒、饲料荒，而国外乘机要挟，调高粮价，又如何应对？会不会发生“粮食战争”？如果转基因的隐性的负面的威胁显形爆发，那就是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呀！能否从现在起努力寻求对策，逐年减少进口的同时又保证我们所需的粮食和饲料的安全。

三、对策和建议

其实，我们只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学习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这一科学论断，按照“第一生产者、第一消费者、第一分解者”的生物循环法则，思考寻

求对策，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一）一定要有“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指导思想，坚决发展中国的大农业。坚决打破“封建割据”。各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分封割据”没有出路，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坚决反对撕裂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保卫生命共同体。中国是大一统的大国，历史上凡是分封割据时代必然是兵燹战乱、民不聊生。只有大一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按控制论、系统论办事，地方才能有序发展。这是治国的必然。国家按控制论、系统论进行大部制改革方是正道。这是对生命体的捍卫和维护，是按科学规律办事，是维护生命共同体活力的最有效政治性举措。

（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使劳动力资源、生态经济资源质优而丰富，否则永无解决的可能。所以必须培育新一代农村劳力资源，注重人力资源的质量建设。要尽最大可能培育农村的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经济生物资源，使其最大化和最优化。下最大功夫促进“第一生产者、第一消费者、第一分解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具体说来作为第一生产者的优良物种一定要国产化，国产化的优良物种是千万年的自然选择和社会鉴定认可的，中国育种科学应以此作为主要努力方向。转基因物种历史短，其真正的面貌还不清楚，目前看到的可能是转基因物种某些显性的特征，而其负面隐性的风险系数我们还不能下结论，如果输出方秘藏阴谋，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两国，就因“种子”阴谋而导致一国灭亡。在这一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急功近利，把国家大农业的总体利益作为本钱去冒天大的风险，更不能只看一时一例之利。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难教训难道还少吗？作为第一消费者人和动物要拓展营养食物的空间，中国有十八亿亩耕地，四十三亿亩林业用地，四十亿亩草地、草山，大力发展草本、木本粮油和饲料，大力发展陆生与水生动植物食物，潜力无穷，动力也极大，而且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优势。要把第一生产者的残体、第一消费者的残体、排泄物尽最大限度的资源化，而不是不负责任的随意成为社会的污染源。要重建中国农地、林地、草地的地下良性社会，使第一分解者加快繁衍，成为地下良性社会的主力军，恢复良性肥沃的土地进而促进第一生产者生产健康的产品，最终演变为一个包括人、山、水、林、田、湖在内的一个健康的生命共同体社会。中国的农村，包括小城镇，其现状，一方面是滑向资源贫乏化，一方面又在浪费资源，任凭资源污染化，这是一种最大的祸国殃民的败家子行为。这里可以算一笔帐，以资佐证：在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8亿的期间，被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人畜粪便基本上都资源化了，在此期间，中国食品的安全化程度是最高大的。而人口

从 8 亿到今天的 13.6 亿期间，每年有 33000 亿斤排泄物变成了污染源，加上畜禽排泄物，则接近 50 亿吨！这是骇人听闻的灾难。据说农业部也已认为农业面源污染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染。这个恶耗性浪费足以引起我国上上下下决策者重视了！

（四）拓展发展空间，深入科学创新，培育增加经济资源，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生物经济资源的发展优势是当务之急。解放初期有人讲：“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改革初期有人讲：“若论人均资源，中国是资源不足的国家”。从拓展发展空间层面上分析，我们依旧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是人均来讲，也是可观的。比如，中国陆地面积是固定的，但从拓展发展空间讲，可能翻上一两倍。我国现有耕地十八亿亩，但我们的农业以草本作物为主，农用耕地其利用的土壤空间，充其量也就是二十厘米左右。几十年来滥施的化肥、农药，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物质也就集中在此耕作层。其实农地、草地、林地的土壤厚度远远大于现有耕作层，几倍于现有耕作层的土壤长期未被利用，这是多大的拓展领域，大于现利用空间的 3-4 倍！如何拓展这个未被利用的土壤空间，文章就大了。中国的良田长期不休耕、年年重茬，这是不科学的。十八亿亩农田不能单一地作为草本作物的世袭地，按科学规律改种一些高产高效的木本粮、油、饲料植物，将有巨大的变化，好处是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药、重金属迅速得到数倍的稀释，很可能就使有毒之地转化为无毒之地。因为木本粮、油、饲植物的根系生长密集层至少占据 50 到 80 厘米的土壤层空间。长期沉睡在土层深处的营养也得到了利用和循环。最初数年不施肥也能高产。一次种植多年收获，成本降低，而经济效益更为可观。这不过是拓展了科学思维和创新。

其实追本溯源，今天的农田，历史上是林地、草地，后经开荒而成的。这得力于森林、草原对土壤的修复之功，才能毁林毁草而得肥田。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轮回现象。

中国有近 8000 种木本树种。木本油料粮食、饲料树种十分丰富，超过 2000 种。比如本人多年选育而成的任氏饲料桑，同等的土壤条件，一亩地饲料桑生产的蛋白质总量相当五亩地大豆蛋白质总量。一次种植，多次、多年收获，效益每年都有数千元，是普通玉米、水稻、小麦的数倍。中国每年进口的八千万吨大豆大约相当于 5.3 亿亩耕地的生产量，而我们仅用 1 亿亩土地，就可以解决八千万吨大豆所产的蛋白质，质量还远远高于转基因大豆。仅这一笔帐，一进一出，价值达数千亿元！农民能增加多少收入，又能提高多少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能增强多少国家实力！当然，进口转基因大豆还为了产出油脂，在四十三亿亩林地中发展若干面积木本油料，加上草本油料作物，即能

解决油脂生产。仅此一例，我们便可轻而易举的解决人民担心的忧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包括鱼类生产在内的畜牧业商品饲料价格逐年提高同时还有很大的安全风险，不法商人在利益驱使下，滥加抗生素和激素。畜牧食品问题多多，令人恐慌，如果采用国产的木本、草本混合具有解毒、排毒、泄毒的药食同源的饲料，则又从源头上保证了畜牧食品的安全。中华医学是五千年的文明成果，不但用于人类，也能用于畜禽动物。历史上抗击人畜瘟疫皆得益于中华医药学宝库中的奇方妙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肩的。如此，不仅使养殖户大大降低防疫治病费用，又因食品质量提高增加经济效益，更减少了不法分子的破坏机会，这对于国强民富又具有多么伟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如果我们坚持“三个第一”的生态物质循环规律，走上肥料有机化的道路，则因有机肥具有的腐殖质和腐殖酸，对土壤重金属起到吸附、螯合、固化的作用，有毒之地又恢复成了沃土好地。作为泱泱大国，文明古国，又有何惧呢！中国有不少地方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束手无策。有些科学家断言治理至少要十年，治理成本至少每亩 50 万元。照此计算，中国 3 亿亩重金属污染的耕地治理就要花 150 万亿元人民币！

（五）数十年来，中国畜牧业比重越来越高于种植业，然而却逐步走上了由以养为主转为预防为主的被动道路。而以养为主，强身健体，促进机体免疫力增强，是发展健康畜牧业的正道。疫病感染的对象往往都是病弱免疫力低下之动物。世界生物界中的共同规律也就是如此。利用任氏饲料桑生产的桑饲料，饲养鸡、鹅、猪、羊、牛、兔、鱼已有十多年的实践，不搞免疫，不用兽药，而免疫力普遍高于进行免疫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免疫的，同时因为饲料桑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和生物钙，结果所产出的系列性畜牧食品皆属于抗衰老食品范畴，当地畜牧管理部门历经数年，由怀疑跟踪检测直到完全信服。全国省市以上十三家检测单位通过不定期交叉检测，所有系统性数据均证实了上述的事实。中国畜牧界权威任继周院士认为此项科研成果已达到世界水平。因此，畜牧业究竟采取以养为主、防治为辅，还是以防为主的政策，当要认真考虑和决策了。

（六）粮食安全问题。如果我们农业能和中华医药结合起来，利用药饲、药食同源的经典方法，则又有了保证粮食安全的新空间。比如利用任氏饲料桑药食同源的优势，制成药食同源的添加剂，使一些有安全问题的小麦、玉米成为健康的粮食，不但保证了粮食安全，还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的粮食产量，提高了粮食质量。例如已经问世的就有桑叶面粉、桑叶玉米粉、桑叶米粉、桑叶面条、

桑叶面包等。细算这些帐，空间又是何其大哟！

笔者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实践，用大量的系统性数据证明了中国“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质优量富的生态经济生物资源系统的建设问题。只有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才能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鉴于中国超过十三亿人口的总量，大量农村劳力资源的转移，大批农田的抛荒和带病作业，农业缺失足够的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益的现实状况，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严格遵守生物科学的循环规律，大力拓展优质资源，厚植贮存生态生物经济资源，这应属当务之急。让中国农村优质的生态、生物资源遍布于山川、平原、草地，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利用的、巨大的生态经济生物资源大库。所以人们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们既解今日之难，更为子孙后代贮藏了丰富的资源，必然能使中国成为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强的世界强国。如前所述，如果我们能将上面说的 50 亿吨人畜禽排泄物转化为有机肥资源，则生态、经济效益又当属于一个天文数字了。为了有序发展，可以在各省、各县先行建设示范点，以点带面，典型开路。假如每个县建一个示范点，也就是 2000 个示范点，通过示范带动，就能使桑产业及类似产业在全国持续、有序、健康地发展起来。只要将目前的扶贫支农资金从科学层面上调整一下，即可解决经费的来源，岂不是事半功倍之举呢！

为此，不揣浅陋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像建国初期那样，政府派出“三农工作队”，坚持在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规律前提下制定保卫农业、保卫农村、保护农民的系列性政策并落实到基层。

第二，责成中国农、林、水、畜牧等各级各学科技术人员，严肃认真上山下乡，遵循生态系统循环之科学规律，治水、治山、治理病土病地，科学种养无公害作物，把实实在在的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破解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让目前在电脑上以虚拟性论文作为考核科技人员的坐而论道、坐而晋升的政策边缘化。

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科技工作者，老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一条可以安下心来体现生命价值的道路。回看社会和人生，我的体会是，凡是为个人的名利奋斗，其实是失败的人生；为民造福，为国分忧，才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可以真正安生立命的光辉的人生道路。

（作者系中国老教授协会国杰研究院林业咨询部主任，重庆海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注农业走出去 互利共赢发展境外农业合作

朱丕荣

我国是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具有独特的成就,是用世界 9%的耕地、6.5%的水资源,养活着占世界 1/5 的人口,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但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我国人多,水土资源紧缺。人均耕地 1.4 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人均水资源只 21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1998——2012 年全国耕地面积每年平均减少近 1000 万亩,农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二是受气候多变与生态环境、农业资源退化的威胁正在加大。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展及人口增加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四是农业劳力、生产资料、基础设施投入相应增加,成本提高,增收增效难度增大。因此需要考虑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进行合理布局,积极开展农业国际合作,进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调剂,扩大投资,加强农业援外和境外农业开发,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推进世界农业进步与发展,确保粮食安全。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战略问题,应当认真研究对待。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都有很大进步,农业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不断扩大,特别是支援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有所贡献,中国农业国际地位与信誉有了很大提高,为农业走出去,扩大境外农业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大国,目前也是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 1990 年 4000 多亿美元,2009 年 1.2 万亿美元。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 2009 年为 913.6 亿美元,占全球的 7.6%。

我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 年到 2013 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由 306 亿美元增加到 1867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 181 亿美元增加到 678.3 亿美元,进口额由 125 亿美元增加到 1188.7 亿美元。2014 年农产品贸易总额 1945 亿美元,其中进口 1225.4 亿美元,出口 719.6 亿美元。从 2004 年开始,我国农业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逆差不断扩大,2004 年为 11.3 亿美元,2013 年为 510.4 亿美元,2014 年为 505.8 亿美元。

进口的农产品数量有所增加。如 2014 年进口谷物 1951.6 万吨(出口 76.9 万吨),净进口 1874.7 万吨,大豆 7140 万吨,食糖 349 万吨,棉花 267 万吨,棕榈油 532 万吨,豆油 114 万吨,还有橡胶、畜产品等。出口创汇多的主要是水产品、蔬菜、水果、特产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现在我国为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增”。这不完全是吃不够,而是由于国内外差价大。自 2012 年起,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价格超过国际市场 40%—50%。2012 年的大豆价格国际上每吨为 600 美元,2014 年降到 400 美元。进口便宜,有利可图。

我国农产品进口依存度，2001 年为 6.4%，2011 年为 11.8%，其中大豆依存度高达 90%。粮豆进口量已近 1 亿吨，突破了自给率 95% 的红线。据预测，今后几年内，每年对农产品需求的刚性增长为：粮食 80 亿斤，肉类 80 万吨，食油 100 万吨。专家们测算，目前进口粮油大体使用 8 亿亩播种面积，相当于我国播种面积的 1/3，预计到 2020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供需缺口相当于 10 亿亩左右播种面积的产出。

粮食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继续抓紧，毫不放松。要坚持立足国内，确保产能，并要很好地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与市场，把握好进口规模，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合作开发境外农业，互利双赢建立巩固的粮食基地，共同发展，推进世界农业进步和保障粮食安全。

二、农业援外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倡导“南南”农业技术合作，促进各国农业和谐发展。中国农业实用技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如杂交稻、种稻、蔬菜、棉、糖等的栽培，橡胶、剑麻，设施农业、农机具、农用沼气、农村新能源、动物疫苗、水产养殖、养猪、养鸭、种植绿肥等，以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培训人员等援外，推动技术改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减轻贫困、缺粮的局面。据商务部 2010 年统计，我国农业对外援助累计达到 71.4 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援外总额的 5.2%，共向 120 多个国家援建了 229 个农业生产项目，89 个农产品加工项目和 75 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有效地提升了受援国的生产水平，增加生产，缓解缺粮状况，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获得受援国政府与人民的好评。到 2010 年止，我国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累计达 38.4 亿元人民币。我国还通过多边渠道进行农业援外。其中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在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南南合作基金，1994 年提供了 3000 万美元，2014 年又提供 5000 万美元。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技术援助。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其中六项 100 个减贫项目中，就有 100 个农业合作项目。

为服务于整体外交战略举措，承担国际义务善举，农业部门应尽心尽力，进一步做好农业援外工作，吸收过去经验，使之发挥更好的效用。（1）关键要有计划地培养、选拔技术，建立派出专家队伍。农业周期长，需多年持续投入工作，不能短期行为。素质要过得硬，包括业务能力，艰苦创业，政治品德好，外语过关，了解掌握国外农业概况。（2）搞好项目设计，与受援国共同制定规划，双方参与，充分反映受援国的需求和中国的技术优势，目标明确，重点突出。（3）要发挥专家团队优势，每个专家组根据项目内容，搭配好 3—5 个专业人员，实干苦干，确保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还要由受援国协助配备必要的设施条件。（4）健全完善外派政策支撑和保障体系，包括培训、选拔、财务管理以及津贴、待遇、奖惩、考核、晋升等细则，充分调动专家的积极性。

三、对外投资，兴办农业企业

2007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加快农业走出去的战略。近年来以国营企业（包括中央、地方）、民

营企业、社团采取直接投资、合资、并购、租赁等方式，对外兴办农业企业。内容包括粮油作物、棉花、橡胶、园艺作物的种植加工，畜牧养殖与加工，兽药、物流体系与设施农业建设，远洋渔业捕捞加工以及森林资源开发等。据商务部 2013 年底统计，中国农林牧渔对外投资企业共 254 个，投资存量达 71.8 亿美元，实际情况可能超过统计数字规模。据农业部 2013 年资料，中国农垦在 42 个国家建立了 113 个境外企业和发展项目，种植面积 26.67 万公顷，当年生产粮食 100 万吨以上，产值 194 亿元人民币。从事粮、油、糖、橡胶、畜禽等主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综合经营。农垦集团要进一步实施联合、联盟、联营三大战略，以谷物、橡胶、奶业等产业为主导，尽快推进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今后 5 年走出去，建设开发垦区土地达 1 亿亩，再建一个新农垦。2013 年中国双汇国际集团公司以 47 亿美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有 460 座养殖场，并与 2100 家企业有合作)。伊利奶业公司在新西兰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建设牛奶加工企业。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投资 3.75 亿美元开发大豆生产；在阿根廷投资 12 亿美元，发展大豆、玉米和棉花种植生产。2014 年中粮集团投资 28 亿美元，收购香港来宝集团（农产品贸易）51%股权，收购国际 Nidero 集团（农业）51%股权。中国圣元国际集团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投资 1 亿欧元，建设婴儿奶粉加工厂。2015 年 6 月，黑龙江华俄兴邦投资公司投资 27 亿人民币，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区政府合作，租用俄国 11.5—20 万公顷耕地，共同开发粮、草、猪设施农业建设。

从发展趋势看，需要注意的问题是：（1）企业小而分散，缺乏统一指导和协调。如北京、上海、香港商人近年在法国纷纷收购波尔多葡萄酒庄，向中国出口葡萄酒。据法方反映，波尔多地区 1.2 万公顷葡萄园，其中 21%都被中国投资者收购。（2）不了解国外背景，容易遭遇投资风险。如黑龙江、辽宁、新疆一些企业，在乌克兰办了不少农业企业。目前那里局势动乱，影响正常生产销售。（3）法律纠纷逐年增多。如不熟悉当地的租地期限、劳务雇佣、工资总额、税收情况以及产品输出、设备生产资料进口、融资等规定，会遭遇麻烦。

发展境外农业企业，属新兴大业，涉及国家整体利益，需要有关部门（如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税务、外汇、金融、保险、交通等）统筹协调，规划引导，制定支持、咨询、服务、保护等政策措施，推进把这项事业办好，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为民造福，为国争光，树立良好国际声誉。

（作者为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

关于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探索

孙万鹏

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言眇而趋深”的方向，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长期

以来，城乡之间被一道无形的“峻宇雕墙”所隔离，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近年来，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城乡一体化正在“昂昂逸骥”，逐日推进。

一、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概念

城乡一体化，指在一定区域内，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融合，城乡发展有机结合，形成“以城带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关系。它是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泽演庆世”的顶级状态，体现了城乡之间联系和社会进步的要求^①。对城乡一体化概念的科学理解，应把握以下几点：

1.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同一化。城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式，各有“空谷传声，城堂习听”，城乡一体化不是将农村建成城市，也不是“冰消互解”农村，而是“以人为本”，通过城乡布局的“统筹规划、功能协调、要素流动、服务均等”，达到城乡发展权利平等、产业平衡、服务公平，使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都过上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同时保持城乡各自的特色，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良性互动。

2.城乡一体化第一要务是发展。城乡一体化“兴天下同利”，“责有修归”靠发展。它是建立在城乡经济社会整体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一体化。体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和“从之者如归市”的市场化。当然，要图此等的发展，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最重要的是要改革城乡分治的“原本之制”，促使城乡的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正道弛兮离原流”，“流畅而不凝滞”地进行合理流动，促进社会生产力在城乡全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避免“适领一业，未窥全豹”，形成城乡平等对待、城乡统筹指导、城乡“协力同心，声律相协”发展的制度环境。

3.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国民同待遇。城乡一体化“所归者一，所行则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各方面，其核心是解决城乡居民的不同国民待遇问题，实现全社会成员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上的权益与机会平等，可谓是“偏生暗，公生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不公”，让城乡居民“共条同贯与，何城乡之异”，共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二、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总得说来，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是“湛湛露斯，不为丰约举”十分丰富的。涉及城乡空间结构变化、经济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结构变化等诸方面。可以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发展目标，也是一个“八达九房”的复杂、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内涵丰富，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

1.关于城乡人口的一体化。人口是经济社会“博求幽隐，发扬岩穴”的主体，通盘筹划城乡人口协

协调发展，是统筹兼顾城乡发展的“门熟之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中，必须重视城乡人口发展政策和规划，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要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合璧、日月同升。实际上，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城乡以人为主体的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在互补性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流动有序、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人口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乡经济共同发展。

2.关于城乡空间布局的一体化。城乡是两种“典卖更易，以土曰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城乡一体化不仅涉及城乡经济转型、产业“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而且还涉及城市和乡村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般而言，城乡空间结构是由点（城镇等点状设施）到线（交通等线状设施）构成的拓扑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研究“点和线”如何布局，如何紧密相连，即城镇体系与交通、信息体系的构建问题。科学、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梅青巧配吴盐白”的配置，通畅、便捷的城乡交通和信息网络连接，不仅有利于促进城镇繁荣，而且能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达到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共进的预期目的^②。

3.关于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它应包括城乡政治生态、法律生态、经济生态、生物生态、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医疗生态等一体化。这是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纳入一个大系统加以考虑，全面治理的重大转变。这是改变以往将城市污染生态环境严重的单位，迁往农村了事的恶劣做法的“拨乱反正”。这是确保城乡社会事业“声律相协和谐生”的大事，是确保城乡在各种“生态”方面享受同样待遇，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差别的关键。这样才能为城乡创新公平的发展环境和生态空间，让城乡共享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彻底改变城乡生态现状，形成城乡各种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格局。

三、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理论

研究表明，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理论，总是处在“三极发展”的态势之中。近十年来，从笔者游考五大洲 50 来个国家看，直接以城乡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文献并不多。现选择几个介绍如下：

1.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这是公认的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③。据介绍，远在 1898 年，埃比尼泽·霍华德发表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具体阐述了他的田园城市理论。他认为城市和农村各具优点和缺点，强调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展。而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农村和城市的“深相结托”的结合体，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书中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其实质是“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应该说，田园城市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城市规划思想与方法，同时也为城乡发展提供了“事有适可”的有益思路。

2.芒福德的城乡一体化理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是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他的

理论观点是：“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强调“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他主张建立大量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同时把城乡两者的要素统一到这一多中心的统一体中来，重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平衡，可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使全部城乡居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最终才能实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

3.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去年10月中下旬，笔者在游考芬兰时，多次听到芬兰人对沙里宁(Eliel Saarinen)的夸耀。返杭后，笔者查到了伊列尔·沙里宁1943年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④，了解了这位大师的有机疏散理论。他认为，城市的发展和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他以树木例，指出：大树枝从树干上生长出来时就本能地预留了空间。他按有机疏散理论将大城市这块异常拥挤的区域土地分解为若干个集中单元，将城市的人口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远离中心的地域。1918年，他的理论在实践方面形成了著名的芬兰大赫尔辛基方案，在二战后许多城市的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同声相应”。产生了世界性的响应，可谓是“惠迪吉，从逆凶，帷影响”。

四、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模式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月迅迈”，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博议进取”，促使城乡发展逐步进入了一体化阶段。其中法国的新城模式以及日本和美国的城乡一体化道路都比较成功，“有实其积”，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

1.关于法国“新城”的模式。笔者在巴黎游考时，深深感到：巴黎“新城”为恢复巴黎大城市地区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条条“高车驷马带倾覆”的快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将巴黎旧城和新城区紧密相连，使得新城区和巴黎老城区优势互补，“沃野百里，地势形便”，在形态上、职能上融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据了解，该国为避免城市过度膨胀引发的城市病，科学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从根本上防止了城市无限制占有土地，保护了农业的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保留农田，成了城市之间的绿化景观。通过这种城乡交叉模式，新区本身就是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新城”建设又与农村地区开发有机结合，发展了房地产、商业、旅游以及其他产业部门，带动了原农村地区现代化。还值得指出的是，整个城市建立了9个副中心城市，设计了不同功能区，对市区有关行业征收“拥挤税”，对从市区搬迁到郊区的工业企业给予搬迁补偿费，对从老城区迁出的各类机构给予15%—20%的投资津贴，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和经济措施实现了城乡平衡协调发展、进退有度、共同繁荣的局面。

2.关于日本城乡一体模式。日本为了用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出台了如《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半岛振兴法》《山区振兴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事业创新促进

法》《大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人口过疏、产业衰退、基础设施滞后、文化水平落后等问题。另外，加强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除财政拨款外，还通过发行地方债券的方式融资。如1998年投入10840亿日元，1999年增至10910亿日元。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缩小了城乡的差距，加强了城乡间的“珠联璧合”，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

3.关于美国自由发展方式。美国城乡一体化的“圭璋特达”之处，是通过兴建大量州际公路，便利城乡交通，推进城乡一体；通过区域规划避免重复建设，保证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协调一致；通过宽松的土地政策，便利的灌溉工程，不断加强农地改良，提高耕地质量；通过加强农业技术发展来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通过促进城乡融合，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大批乡村人口。一言以概之，美国的大都市地区，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谓是“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推动城乡的“涇涇自力”、自由发展，可谓是“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形成了城乡融合，以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状态。

备注：①沈红、陈腊娇、李凤全：《城乡一体化研究现状与展望》，《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5年第4期。②完世伟：《区域城乡一体化测度与评价研究——以河南省为例》，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6年学位论文。③王广起、陈磊、吕贵兴等著：《区域城乡一体化测度与评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④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

健康箴言

刘济民

编者按：这是刘济民同志近日写的23则健康箴言，源于他给老年人、年轻人和亲友们多次讲过的一些内容，提炼为箴言，都是自己的感悟体会，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表达方式，不乏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这个箴言，讲的是大健康，涉及的健康问题很广泛，而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是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也可以说是千健康万健康，精神健康是第一健康，是诸多健康养生的灵魂。健康养生的关键是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自觉调整和排除影响身体健康的心里障碍，端正健康养生的方向和方法，增强其效果。

（一）每天做到“四好”

走好每一步，活好每一天；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关；悠悠岁月平常心，从容闲渡跨百年。

（二）每日用好三餐

坚持科学安排早餐，对人的健康，不是影响一天，而是影响一生。早餐是金，午餐是银，晚餐是铜。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究竟如何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则应因人而异，不便照搬照套。一般做法是，早餐蛋白为主，午餐热量为主，晚餐维生素为主。

（三）日行万步，寿高百年

少坐，多动，尽量走路。久坐容易使人懒散，使人精神不振，甚至容易生病。走路作为运动，年轻人要狂走；中年人要走快走；老年人则应根据健康状况，步伐适当放慢，不宜快走。

不要拒绝晒太阳。走路中结合晒太阳，可尽收补充钙、转化钙、留住钙之功效。

（四）健身三法

贵在坚持。生命不息，锻炼不止。要有特别坚强的毅力，要有很不寻常的意志力。

重在养心。生命不息，修炼不止。要有超越常人的功力，要有非凡的定力。荣辱得失莫存于心，喜怒哀乐不行于色。难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必照搬照套，不要从书本出发，不要被别人误导。要从自己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的心理症状出发，真正见到实效。

（五）养成良好习惯

好的习惯，有益健康；不良习惯，危害健康。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各样的习惯中渡过的。良好的习惯，是一种自觉的、愉快的自我约束，不觉其苦，却以为乐；良好的习惯，还是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力量，给人以生机和活力。把好的习惯融入生命，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必定得益终生，受益无穷。自省，是个非常好的习惯。经常审视自己有什么不良习惯，痛下决心，断然改正。人们的不良习惯，危害最大者是惰性。心思散乱，踌躇无主，没有定力，必然惰性缠身，事事无成。摒弃惰性，追求健康，要立即行动。

（六）追求身心健康

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追求。身心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石。“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白居易）追求身心健康，需要毕生的锻炼和修炼。锻炼身体为本，修炼心灵为魂，一个人拥有了这两样功夫，就拥有了健康人生；就融入了社会，融入了山水之间，融入了芸芸众生当中；那就是一种如坐拥春风、如沐浴阳光的感觉，那就是返璞归真境、得道成神仙；那才是真正的福分，那才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七）仁善静

仁者寿，善者寿，静者寿。集仁、善、静于一身者，必定大福大寿。

每逢暴热时节，总会想到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那首七言绝句《夏夜追凉》：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我们做人做事，不妨也来个“夏夜追凉”。一缕清风回荡处，但能心静即身凉。在滚滚热浪袭来时，面对无奇不有的捧场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诱惑，时时保持一种冷静和清醒，保持一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得意时不忘形，倒霉时不惊恐，门前冷落不趋炎，狂风起处不追风，在无休止的赞美声中不“晕菜”，盛名之下不奢求，是为头脑冷静、心地干净。这就叫集仁、善、静于一身。

（八）人生的主题

人生的主题不是享受，是奉献；不是升官发财，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德为先；诚实，善良，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做事，民为本；爱民，敬业，尽心尽力，实实在在。做学问，乐为尚；勤奋，执着，持之以恒，永无止境。

（九）做人九字真言

普通人，平常心，大觉悟。所谓大觉悟，是觉悟到自己是普通人，就会有平常心，是为本真，是为秉性。

（十）自我定位

自知不易，自律更难。知止知足知荣知辱知冷暖；自戒自律自省自牧自奋蹄。

（十一）知足常乐

因为知足而感恩；因为知足，总觉得是小材大用；因为知足，从来就习惯于过那种普通人的简单、素朴的生活；因为知足，从来没有升官发财的念想，只求平安、健康、能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就是天大的福分了。

（十二）坚守自信

人要有自信。自信源于真理在手，担当在肩，诚实 在胸。自信的最高境界是宽容、大度。自信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智慧的力量。

（十三）绝不媚俗

“人为万物所累，减除得物累，便入圣境”。人们没必要活得那么累，没必要背那么多包袱。没必要劳神费力去找后台，靠权贵，傍大款；没必要低三下四去陪吃、陪喝、陪笑脸，送钱、送物、送什么；没必要卑躬屈膝、曲意奉迎，整天价去琢磨什么人的脸色、眼色、颜色，等等；当然也用不着战战兢兢地听从什么人的差遣、吆喝，成为什么人的附庸。做人要有自己的尊严，决不能往那种烂圈子里钻。“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这就是起码的人格，这就是做人的底线。

（十四）提高自控力

有个新名词叫逆商，即人的摆脱困境、走出逆境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自控力，有能力制忧、制悲、制怒。面对各种各样的难事、烂事、不公平不痛快的事，要从容，要冷静，想办法排遣，想办法突围，走出逆境。自控力是一种境界，要有长期的、甚至是极其痛苦的修炼。

（十五）在逆境中重生

“最可不幸者，是没有遭遇不幸的人”。其实，逆境是人们不可多得的财富。逆境是熔炉，逆境是良药，逆境还是试金石；逆境可以使人聪明起来，真正懂得人生的艰难；逆境可以成为人们发奋自强的大学校。只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自信、自立、自强、自救，人们必定在挫折中挺立，在逆境中重生。

（十六）慈悲善忍

“世上世事，莫不成于慈忍，败于忿躁。故君子以慈养德，以忍养情。”（明代藕益大师）
慈忍，不只是忍让、忍耐，甚至忍辱；也不只是宽容、豁达、大度。

慈忍，是大境界，大智慧，大品德。想到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一段对话：

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回答：“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就叫慈忍。

（十七）敢讲真话

讲真话，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讲真话是人的天性。小孩子不会说谎，叫做天真。现如今，讲话也要看“行情”，看“市值”，看什么人的“脸色”，实在是一种悲哀！讲真话是一种尊严，是一种责任；是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讲真话，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对得起那个大写的“人”字！敢讲真话，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十八）读书是一味良药

积善最是寡欲，至乐无非读书。把读书和健康养生相融合，其乐无穷，其妙无穷。追日追月追时光，苦读天下经典；乐山乐水乐清欢，静养浩然正气。据说，意大利一些药店的药盒里不完全装药，有的药盒里装诗歌；医生和诗人合作研制的“诗药配方”，可用以治疗多种疾病。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西汉·刘向）、“书中自有妙药”。（秦牧）读好书，可以医愚健脑，祛病益心。读好书，可以提振精神，愉悦情怀。马克思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种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

（十九）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崇高的品质。那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清雅和圣洁。那是将心比心的一种善良。那是一种总是为别人着想的高贵品德。那是在别人危难之际援手相助的一种大恩大德。我这里向关心我、帮助我的各位好友鞠躬致谢了！

（二十）向吴仁宝学习

江苏的华西村，我去过无数次。每次去华西，都是一种寻访圣地、行施朝拜的感觉。

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充满活力。那里没有贫穷，没有恐惧，没有贪腐，没有刑事犯罪。那是一片净土，一片沃土，那是村民的福地，真正的人间乐土。那里的村民实现了共同富裕，真正过上了幸福、安康、有着足够体面和尊严的好日子。那里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互包容、完美融合。这个总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1500多人、曾经特别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在以一位普通农民、老书记吴仁宝为带头人的真正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丰功伟绩，创造了人间奇迹。人们在华西村，依稀看到了喷薄欲出的共产主义的曙光。

人们都向往天堂，我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我看，华西就是离天堂最近的村庄。

（二十一）敢于担当

近年出现一个新词汇，叫敢于担当。前几天到华西村朝圣，对于领导干部究竟应该担什么、当什么？似乎若有所悟。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同志担的是什么？他担的是责任，担的是使命；是下决心使华西村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责任，是一定要使华西村民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神圣使命。他把华西村全体村民的艰难愁苦和良好愿望都扛到自己肩上，把全村的许多难题都破解了，很精彩，很神奇，很有创意；村民为之欢呼，国人为之感动，世界为之震惊！

老书记当的是什么？他不是当官享受，他是当家受累，他是全村的当家人。

他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亲民如子，惠民如子；他的人生哲学是：“心里只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为了让全体村民过上富裕幸福、有着足够体面和尊严的好日子，为了兑现他五十年前的承诺，他一辈子舍命奉献，拼命工作。积五十年之功力，耗尽了自己的一生辛劳和智慧，硬是累病了，累倒了，累死了！

这就是敢于担当。老书记和他的领导班子，就是靠着这种牺牲自我、敢于担当的精神，把那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华西村打造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堂、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吴仁宝同志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敢于担当的楷模。

（二十二）向孙万鹏学习

孙万鹏同志曾任浙江省农业厅长。他以超越常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研究灰学理论，成为灰学创始人。他还创造性地把灰学理论用于小说、诗歌、电视剧等文学创作。尤其使人震撼的是，他别出心裁地把灰学理论运用于战胜癌症。

1987年孙万鹏已是肝癌晚期，准备手术时，自己从手术台下来，断然谢绝手术、化疗、放疗等常规临床治疗。他的父母和弟妹都患同样的癌症，都是在手术后不久去世的。既然手术、化疗、放疗也难免一死，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另寻生路呢？他潜心学术研究，坚持锻炼身体，坚持修炼《舞动论》健康养生法，以增强自身战胜癌症的能力，居然大见成效。从发病到现在二十八年了，没有复发。我们从孙万鹏同志那里，看到了那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大毅力大品德的伟大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十三）恰到好处

人生百年，凡大事恰到好处，很难。我这大半生，虽未盖棺论定，已属来日无多、渐成定论；回头看看：知止知足知冷暖知好歹，正是恰到好处。身材不短不长，适当；体重不瘦不胖，强壮；血压不低不高，正常；心跳不慢不快，舒畅；老伴始终一个，原配；孩子儿女双全，一对；工资不少不多，珍贵；工作尽职尽责，无愧；追求升官发财，不会；只求老少平安，宝贵；多灾多难多险，面对；多有贵人相救，感怀；全家定居太湖，畅快；出入如鱼得水，常态；喜成恰到好处，善待；與君戏说人生，笑对。

在第 52 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的发言稿

孙万鹏

尊敬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Sri Lankas President Mahinda Rajapaksa）、组委会执行主席斯里兰卡卫生部长斯瓦尔（Sri Lankas Health Minister Aswld）、国际交流医科大学校长莫汉（Mohan）先生，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让我为这次大会在科伦坡，帕玛拉通珈国际会议中心（Colombo, Palmers yoga international）胜利举行，表示热烈地祝贺！（鼓掌）并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第三医学在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ird medical in china）

一、关于“第三医学”的思维逻辑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形式而存在的。世界灰色系统理论创始人邓聚龙教授，1982年将系统分成三类，即白色系统、黑色系统和灰色系统，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建模大会上，赢得了“系统科学的明星”之美誉。《系统控制通讯》主编、德高望重的哈佛大学教授洛克特，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创新”。

1998年7月，笔者的41万字《第三种科学》正式出版，一个多月后的8月22日，科学大师钱学森给我写信说：灰学 gray science 是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就有 MIT 的 Forrester, Denais Meadows, peter Senge, 还有 Santa Fe Institute 等，所以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理论。”（见钱学森 1998 年 8 月 22 日给孙万鹏的函）

那么，笔者为什么在 2012 年又提出“三种医学”呢？因为，医学也可分系统，医学也是科学，具同构性。

在笔者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是可以一分为三的。“三才能生万物”。正如“红黄蓝三色才能生万色”那样。西方的传统哲学，总是热衷于对立两极的研究，把矛盾的双方对立起来，因而产生了斗争哲学和优胜劣汰论。事实上，一切对立的两极是可以通过中间部分相互过度的，中间部分就是第三极。“两山之间必有一谷”，“两水之间必有一波”，“两极之间必有一伏”。科学家安布鲁斯·弗莱明，发明了真空二极管，但只能用于检波，而不能用于电信号的放大。科学巨人李·德福雷斯特，在两极之间加上了第三个电极，于是出现了伟大的奇迹。在第三极施以弱电流，在第二极就出现等比例的强电流，即信号放大（发展）了。于是开启了无线电波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华夏文化“天人合一”观的科学版认为，“天命与人生是统一的”，人体系统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统一的。中国水稻所李太贵研究员，几年前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生物进化单位”半导体式的三极进化体，就是对“天人合一”的有力证明。

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医学与世界各国传统医学的两极冲突史，是对“天人合一”思维逻辑的违背。“西方医学-东方医学-第三医学”的三极发展，才是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董光壁先生所说的“天下第一梦”。

如果说，西医是医学领域的第一种科学——西方经典科学；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则是扎德（zadeh）的模糊科学，有时模糊往往更为准确。那么，“预防为主，综合养生”的“非毒保健（凡药三

分毒），是克服日益严重的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第三医学，它融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为一体，通过继承与创新，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医学体系。如果说，“辨病施治是以病为本，辩证施治是以证为本，那么，辨人施治才是以人为本”。正如，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医院核医学主任医师周新建所说，第三医学是“人性化全息治疗体系的最高境界。是医学发展至今尊重人性，以人为本的必然产物。进入 21 世纪，第三医学成了与东西方医学并驾齐驱的医学体系，为现代疾病治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关于“第三医学”的理论体系

目前，“第三医学”在中国，经过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原副院长任养勤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王凤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医大师”颜正华等人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改错论》《固本论》《骨髓论》《营卫论》《平衡论》《元气论》《经络论》《舞动论》《气质论》《短板论》的框架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互联网医疗”正以黑马之姿，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阿里巴巴创始人，目前已成为中国首富的马云预言：下一个超过他的人会出现在健康产业。

2014 年以来，起步于传统产业的新希望产业基金，已以 1.5 亿（人民币）入股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联手云锋基金耗资 10.37 亿（人民币）收购中信 21 世纪，尝试打造“未来医疗”。

2014 年 9 月，腾讯以 7000 万美元投资牵手成立于 2000 年的丁香园网络平台，启动多平台合作。

第三医学《穿戴论》（健身衣、健身鞋、袜等），《智慧论》的智能腕表、预测器、预防器等，都可能应运而生。杭州滨江打算用 10 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千亿级的《智慧论》医疗产业基地。

在笔者看来，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医学，也属于第三医学的范畴。阿育吠陀为梵文，属古印度语，据笔者理解，它表示“生命科学”或“生命智慧”的意思，它与第三医学《改错论》相似，打破了对医学概念的看法，同时教会人们如何正确生活。阿育吠陀医学强调，为了健康、幸福地生活，最重要的是注重日常生活方式。正确的饮食生活，充分的睡眠，再加上适度的运动，如果我们用心做到这些，自然可以防止很多疾病的产生。并且通过熟知自己的气质，能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产生疾病。

另外，阿育吠陀医学也与第三医学重视《平衡论》相似，认为生病不仅仅是因为身体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而是整个身体系统失去了平衡。阿育吠陀医学往往会通过能量元素平衡来判断个人的

气质，从而借助自然界的力制作与选择各种精油。如用 Abhyanga(涂抹油)按摩全身，缓解肌肉疲劳，改善血液循环，使全身放松从而消除疲劳；用 Shirodhara (滴油疗法)对于与头、颈部、眼睛、喉咙、神经相关的疾病有很好疗效，比如压力过大、慢性头痛、偏头痛、失眠、麻痹、心脏相关的疾病等；用草药蒸汽浴减肥；用鼻子吸入草药的蒸汽，治疗鼻塞；用阿克西·塔尔巴纳加精油，缓解眼疲劳；用宾达斯埃达(草药)，治疗神经痛、风湿痛、肩痛、麻痹等疾病；用纳斯亚·卡尔玛(草药+精油)治疗慢性头痛、面瘫等疾病。

在笔者看来，若将斯里兰卡阿育吠陀医学以及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与我国灰色系统气质理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交叉效应”，通过 GM (I, N) 模型，加以量化并赋予预测功能，必定能取得“治未病”无毒治疗的更佳效果。

三、关于第三医学《十论》的简介

1.改论错 correct mistakes theory

认为养生就是改错，即改正导致疾病的错误生活方式与负面情绪。除以往主张合理膳食 Reasonable diet 适量运动 moderate exercise 戒烟限酒 give up smoking and limit alcohol 心理平衡 psychological balance 这十六个字，能使高血压 High blood pressure 减少 55%，脑卒中、冠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 减少 75%，糖尿病 Diabetes 减少 50%，肿瘤 The tumor 减少 1/3，平均寿命延长 10 年以上外，特别要重视纠正错误情绪，因为负向情绪会消耗人的能量，导致情绪失控、以致抑郁、生病、发疯、自杀、杀人、家庭失和、社会动乱。目前，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位的大病，还有上升为第二位的可能。解决的上策为“修德、修心、修性”，它是《改错论》的重要内容。

2.固本论 consolidate fundamental theory

认为肾臟为“先天之本”kidney is fundamental of the congenial，脾胃为“后天之本”the spleen and stomach is fundamental of after leaving mother。肾主发育、生长 growth、生殖 reproductive。当人的肾不健康时，表现在小孩身上是发育慢、不长个，表现在姑娘身上是不来月经 menstruation 或不孕不育 infertility；表现在一般成人身上是不易康复，有的表现为未老先衰 not old aging。一般而言，男人肾好不起夜 man kidney health,less urine at night 女人肾好不显老 women kidney health,appear younger“肾精足、肾水足，还可以养肝目，可使精力充沛 full of energy，神思敏捷 thinking agile，增强记忆力 enhance memory，避免脑萎缩，脾功能不良者，易患糖尿病 diabetes。”

3.骨髓论 bone marrow theory

骨髓是健康生命的源泉 Bone marrow is the source of life health

问渠那得清如许？ Ask canal that had so much?为有渠头活水来。 To have a canal head to living water.

研究表明，人体每秒钟就有 800 万个左右血细胞死亡，并有几乎相同数量的血细胞诞生，而负责炮制血细胞的就是骨髓。骨髓老化会直接导致如老慢支、糖尿病 diabetes、冠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高血压 High blood pressure、失眠 insomnia、骨病 Bone disease 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恶化。一般在 45 岁后骨髓会急剧退化，60 岁时骨髓机能仅为高峰期的 2%，人体抗病能力下降 75%。

4.营卫论 nutrition defense theory

所谓营卫就是营养 Nutrition 与免疫 immunity 防卫。营养的问题是搞好“食疗” ”food therapy”，不能靠吃化学 chemical 补品。主张“厨房”为重”kitchen” is the key,“药房”为轻“pharmacy” is auxiliary”。

研究认为，现代医学对人体免疫防卫系统存在许多误区，如盲肠 Cecum 是由免疫细胞 immune cells 充塞而成的，能抵抗下腹部各种各样的感染，但是她的命运往往与扁桃腺（注：也是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的一部分）一样，往往会轻易被割掉。如果你的免疫防卫系统 immune defense system 不工作的话，你只有 24 小时可以存活。

5.平衡论 balance theory

认为酸碱平衡 acid and alkali balance、营养平衡 nutrition balance、生熟平衡 Raw and cooked、饮水平衡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动静平衡 dynamic and static balance、阴阳平衡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十分重要。

如酸碱平衡 acid and alkali balance: 糖类 sugar、蛋白质 protein、脂肪 fat 都是酸性食物 acidic food; 而维生素 vitamins、酵素 enzymes，都是碱性食物 alkaline food。纯酸性食物是人体的能量来源，没有不行，但过剩了破坏性很大，也会成为百病之源 the source of all diseases。纯碱性食物不但可以养生祛病，而且使人长寿。人们的日常伙食，应有 80%碱性食物和 20%酸性食物，才能达到酸碱平衡 acid and alkali balance 。

6.元气论 vigor vitality theory

《黄帝内经》 huang di nei jing 说“元气 vigor vitality，所受于天，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意思是

讲，元气是个定数 vigor is a fixed number。它与水谷之气 mizutani gas、呼吸之气 breathing gas、自然之气 natural gas，一起补充 supplement，维持人的生命 sustain human life。其实，印度古典医学 indian classical medicine 所说“人体存在一定比例的基本物质 basic material”，就相当于“元气 vigor vitality”。现在很多的研究发现：“元气是细胞才具有的推动人体生长、发育的精微物质”。它会随细胞中 DNA、基因的分裂复制与传承，并变成后天元气。而元气的重要成分之一是 ATP 物质，它是人的细胞之“能量货币”。人有元气百病不生，人无元气万药不灵。

7. 经络论 collateral channels theory

在中国的《黄帝内经》里，经络概念贯彻始终。它是经络里肌体不同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切点。在印度外科经典著作《妙闻集》中，也提到“经络”有 24 条，并进一步细分众多的小分支，“穴位”有 107 个，并有详细的“刺络放血疗法”（chakra 针刺方法）。经络是看不见，摸不住的。经络只有在活的肌体或者说活系统才存在。所以，不可能在解剖尸体时找到人的经络系统。但经络确是一种客观存在，隐性存在。它不像有形的公路、铁路，而像飞机的无形航线。经络论为针灸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王文远教授创立的平衡针灸三靶学说，成了第三医学的典范之一。

8. 舞动论 fitness theory

认为护元提肛法（养肾），鲤鱼打挺法（健脾），孙猴挠痒法（调心），顶天立地法（疏肝），打开天窗法（宣肺）等等……

公元 100—200 年，杰出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在治疗上，就提出了体操、按摩等舞动论内容；台湾舞蹈治疗研究会理事长李宗芹教授，就有 20 多年舞蹈治疗的临床经验。无疑，这些都属于“无毒治疗”的第三种医学范畴。

9. 气质论 Makings theory 也称 E（Extension）C（connotayion）理论

如，斯里兰卡阿育吠陀医学，将人体气质（Makings）分三类：

Vata（梵文：意指风为主）气质——瘦弱、皮肤干燥、怕冷；Pitta（梵文：意指火为主）气质——易出汗、大便通畅、有激情；Kapha（意指水和土为主）气质——骨架粗、头发多有光泽。

根据邓聚龙教授的灰色气质理论，气质度 B0 可表示为 $B0 = CB/PB \cup$ ，通过 GM（1，N）模型折射的气质，可赋予第三医学的医学方案。

10. 短板论 Short plate theory

“第三医学”将人体、人与天地、人的五脏六腑，看成是天人合一的整体。

人的健康水平不取决你最好的内脏，而恰恰取决于你最差的那个内脏。就像盛水的木板水桶的那块最短的板，水都会从这里流走。这个最短的木板就是你首先需要认真解决的主要矛盾。

笔者相信，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兴起：《穿戴论》《智慧论》等，还会加入“第三医学”的行列。

（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

借鉴发展“第六产业”概念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郭书田

近日看到有些专家学者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发展“第六产业”，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很有见地，值得重视。

“第六产业”的概念是日本在 1996 年提出的，即通过农业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在人口地少的东亚国家日本与韩国等推行，收到明显的效果。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变单一农业生产结构，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就是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或农工商综合经营实体，有了较大的发展。包括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有 1000 多个，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有 10000 多个，省级以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有 30 多万个，其中龙头企业 10 万多个，年销售收入近 7 万亿元，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大体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由社区农业合作社延伸农业生产链，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另一种是由企业当龙头，通过农民的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销售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对进入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国家在财政、信贷、税收方面有些扶持优惠政策，但不是终身制，每两年评审一次。两种类型的共同点是把一、二、三产业融为一体，通过发展加工业与销售业，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并使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分享这种附加值而增加收入。

最早提出农工商一体化的理论是前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提出两种一体化：一种是纵向一体化，也称垂直一体化，即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另一种是横向一体化，也称水平一体化，即按产业实行专业化的联合。这些理论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苏联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而未能推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在社会主

义国家中率先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称之为农工商联合企业，取得明显效果。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率代表团前往考察后提出试点，一是地方由参加代表团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四川选择广汉、邛崃、若尔盖三个县试点（赵紫阳提出的条件是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干涉）。二是由农垦系统试行。由于国营农场绝大多数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垦建设出来的，有产供销一体化的基础。为此农林部由赵凡副部长率领代表团（团员有北京、天津、哈尔滨市农垦部门负责人）赴南斯拉夫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回国后召开了专题会议，提出在农垦系统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推行（国发 183 号文件）。在考察中，南斯拉夫农委主任尼迈里全程陪同，多次强调在农业部门不搞加工与销售，农业永远处于殖民地状态，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增强了信心。但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工商三者在经营管理上是严格分割的，推行一体化难度甚大。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牵头组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由一些著名科学家组成，把在农业方面推行农工商一体化改革作为突破口，经多次讨论认为在统购统销体制尚未改变之前，粮棉油一类产品难以推行，先从肉蛋奶二类产品开始试行。这就为推行农工商一体化开了头。随着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放开市场，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的条件逐渐成熟。

各地推行农工商一体化的农业产业经营实践证明，它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提高农业增值效益的必由之路，是改变农业弱势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小城镇建设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农产品加工企业有 7 万多家，农产品加工率达 50% 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 2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在全国农村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 10%，第二产业占 22%（全国为 44%），第三产业占 12%（全国为 46%），由此可见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与空间。将发展第三产业与调整农业的功能结合起来，除了经营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之外，把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休闲等文化功能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这就自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的目标结合起来，让“第六产业”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成果。

由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发挥他们的资金、技术、设施、市场等的优势，降低加工业与销售业的成本。在这类企业中，包括进城农民工成为有实力的农民企业家返乡第二次创业，推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他们与农民有天然的亲缘，十分重视保护农

民的利益，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值得在政策上给与支持。城市工商企业充当产业化的龙头，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是龙头企业通过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而不是利用“公司+农户”的形式获得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或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实际上是剥削农户，实行掠夺式经营，这是绝对不许可的。二是龙头企业可以突破社区的封闭性，实行跨社区的经营，发挥大范围的资源优势，提高规模效益，增强抵御灾害与市场竞争能力，但必须以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为前提，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综合目标。三是龙头企业可以在自愿原则下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联合，形成所有制和生产要素多元化的经济联合体——集团公司，走向国际。四是龙头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有一支软实力强的科技队伍，这就会成为吸纳多学科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就业与创业的重要载体，使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经济的贡献率。五是龙头企业的技术路线是工程技术、农艺技术、生物技术的综合运用，而以生物技术为主，包括生物能源、生物防治、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物基因，根治农业的面源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行人工气候与无土栽培技术。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甚大，创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产品，避免雷同化与低水平重复建设。在三个产业的经营管理中运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端技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六是龙头企业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对农村社区的社会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承担一定的任务，成为地方政府与农村社区组织的有力助手，为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做出必要的贡献。

（作者系农业部原政策体改司司长）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各省农委（农业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卢继传

副 主 编：许小平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5015/5016/5293

010-57168089 57206299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农业部北办公区16号楼、18号楼）

部门协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推广培训处 责任人：黄维东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裴红蕾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xyp1102@163.com

